

手工业三史丛书



艺人今昔



轻工出版社

封面設計：趙煥來

藝 人 今 昔

輕工業出版社 編

輕工業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8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18號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787×1092毫米1/32·2 $\frac{16}{32}$ 印張·54千字

1965年10月第1版

1965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100,000—200,000 定價：(6)0.22元

統一書號：7042·002

手工业三史丛书

艺 人 今 昔

轻工业出版社 编

轻 工 业 出 版 社

1965年·北 京

內 容 介 紹

那些巧夺天工的工艺美术品，常会引人发出情不自禁的赞叹。你可知道在它们上面凝聚着多少痛苦与欢乐？这本书里，叙述了七篇真实的故事。主人公是著名的民间艺术家或能工巧匠，有苏绣艺人金静芬，泥人张，面人汤，景泰蓝艺人张殿洪，雕漆艺人刘春林，玉器技工鄂伊启，裁剪技师周坤福等。他们琢玉塑泥，飞针走剪，用劳动和智慧创造珍贵的财富。但是，和千百万劳动人民一样，他们在旧社会遭受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只有在新社会才翻身作了主人，使技艺开放出鲜艳的花朵来。这些血泪史，控诉了旧社会的黑暗，歌颂着新社会的光明，同样揭示出阶级斗争的真理。

序 言

我国手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广泛的群众基础。手工业劳动者用勤劳的双手和无穷无尽的智慧，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对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旧社会，我国手工业劳动者和工人、农民一样，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痛苦生活。而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曾经参加过英勇不屈的革命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从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中，极为鲜明地反映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手工业劳动者才真正得到彻底解放，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在党的指引下，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走上合作化的康庄大道。经过典型试办、普遍发展和全面合作化三个阶段，实现了从个体私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伟大变革。今天，千百万手工业劳动者正和全国人民一道，发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以大无畏的勇敢和忘我的劳动，积极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在前进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同样，在手工业队伍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存在，而且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懂得过去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就不懂得革命；不认清当前的阶级斗争，就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使目前正在进行的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在广大手工业职工中经常进行深刻的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兴无灭资，巩固社会主义阵地。

忆苦思甜，对比今昔，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必修的一课。用手工业劳动者的亲身经历、生活体验和斗争史实来说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真理，对激发广大手工业职工的革命意志和阶级感情，将会更为亲切，更加真实。可以使年长一辈，温故知新，重温过去的苦难和斗争，不忘阶级仇；可以使年青一代，得到启发，受到生动具体的深刻教育，牢记阶级恨。这样，我们就能更深刻地懂得过去，理解现在，热爱未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明确社会主义的方向，加强阶级斗争的观念，坚定革命斗志，继

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革命化的，永不变色的，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就是编辑《手工业三史丛书》的目的。

这套丛书，包括手工业工人的家史、手工业合作社、厂史和手工业行业斗争史等三类，各类分有若干册，将陆续编辑出版。供手工业职工和社会广大读者阅读。

编写这套丛书，是手工业部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基本建设。希望有关部门和广大手工业职工积极支援这一工作，大家动手，编写三史，踊跃为丛书提供稿件，使这一丛书得到更加宝贵的资料和更加充实的内容。

编写三史，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的工作，既无经验，又缺乏知识；恳切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邓 洁

一九六五年七月

目 录

女绣工.....	艾 红 7
泥人张.....	梁 刚 17
忆 苦.....	师 陀 30
从街头到学院.....	石 韧 41
两种生活.....	柯 楚 54
无形的锁链.....	江 川 63
家.....	郭 青 71

女 绣 工

艾 红

引 子

苏绣研究所座落在一个幽美的苏州式庭园里。假山旁桂花正在盛开。刺绣工作室里，安静得几乎掉根针都会被人听得见似的。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正在绣一幅《女民兵》。姑娘把那“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飒爽英姿绣得逼真，可是，那对眼睛的神情却还不够十分生动。这时，旁边的那位老绣工，随手将一支黑丝线劈成二十多支丝绒，双手翩翩地像飞蝶一般，不一会，《女民兵》的一对眼睛就绣得神采奕奕，像在发光。姑娘高兴得嚷了起来：“金主任，你快告诉我，为什么我绣不出这股精神样呢？……”老人慈蔼地微笑了。这位老人就是八十高龄的著名苏绣艺人金静芬。

等她们一下工，我就去金静芬的寝室拜访她。真凑巧，不多久就有位同志送来一个喜讯：她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了。我看她接过人大通知时，双手发抖，眼泪簌簌地落成两行，半晌说不出话来。这是感激的泪水，幸福的泪

水！原来我请求她向我讲述她的身世，她推辞不肯讲，而现在在激奋地说：“好，同志，我就给你讲吧！”

童 年

我一出世，家里生活很清苦，一家七口人全靠妈妈织缎带糊口。九岁那年，妈妈就送我到一家姓范的师傅那儿去学艺。师傅家共收三个小艺徒，都是人长得还够不上绷架，只好踮起脚看绷子，坐下来双脚悬挂着。却日日夜夜的陪着师傅刺绣。再困也不准歇一分钟。在那里绣了三年，什么针法也没学到。母亲看了心里很不好受，便向范师傅求情，才教了“麝和针”法，这才开始绣了一只翠鸟。

十二岁满师后，回家开始独自向绣庄领活。终年绣些桌围、戏装等粗活。为了帮助母亲共同负担这个家，我终日不歇手地绣。有一个晚上，实在太困了，竟在油盏下打起盹来。一不小心，把油沾污了花线。当我从迷蒙中醒过来时，急忙拿起花线来绣花，不料这支沾污了的线，绣到绷子上拖成了一条长长的油渍。这下子可把我吓坏了，母亲的发愁与唠叨还是小事，绣庄老板的斥骂、赔偿损失，甚至再也领不到绣活……怎敢想下去。我的心直跳直跳地不知怎么熬过去。第二天一清早，就悄悄地瞒着母亲去求教邻舍家，才设法将那条长油渍揩掉了。

我妈妈看到自己的女儿终日为家庭重负而操劳，心里十分不忍。她宁可自己熬夜多织些缎带，一定要送我去读书。妈千方百计求人去请求免费读书的机会，总算求得“上海爱

国女子学堂”的免费金。到上海后，我十分珍惜这个读书机会，日夜勤奋苦读。时常饿着肚子上课，我还是熬着、忍着。可是不到二年，还是读不下去。母亲的手工钱怎么能养活一家人呢？只好又回到家里重操劈线捻线的旧艺。

拜 师

苏绣名家沈寿的手艺，当时已在苏州闻名。一天，正巧我在刺绣，邻舍家的尤大妈来玩。闲谈中说起沈寿要收艺徒。我高兴得不得了，连忙拿出自己的几幅绣品，请尤大妈送给沈寿看看。我心想：“自己已绣了十年的花，至今还绣不出翎毛鸟兽，要是能向沈寿学艺就好了，但不知人家看了我的绣品……”想不到，第二天清早，尤大妈就来报讯，沈寿看了我的绣品非常高兴，叫我马上就去学艺。

沈寿的技法，确与当时一般常见的绣工不一样。她在刺绣时，常把鲜花插于瓶中，放在绷架上，一边看，一边绣。绣出来的花朵，往往色彩浓淡适宜，枝叶阴阳协调，真假难辨。人物绣几乎绣得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我坐在她对面，经常看到她时而冥想，时而对镜自揣地构思针法与配色，觉得师傅的一针一线都是煞费苦心绣出来的，深受感动。每当看到师傅这样精心地创作时，我从不打扰她的思路，总是在一旁留神观察，把师傅的针法配色默默地记在心头，到自己创作时，再仔细地揣摩。这样，不到半年功夫，我就基本上把“仿真绣”的各种针法一一学到了手。

一九〇四年，反动封建统治者慈禧太后要做寿。“下令”

要沈寿绣两幅祝寿图。沈寿忙不过来，自己绣制一幅，要我绣一幅。辛辛苦苦整整绣了三个月，可是什么“酬劳”也没有得到！

沈寿被慈禧太后“赏识”了，被招到北京任“女子绣工科”总教习。但是沈寿一人办不了这个绣工科，于是把我们几个艺徒都带到北京去。我那时还只是二十来岁的姑娘，却要教一群娇生惯养的皇家贵族小姐。这群“学生”，根本不可能刻苦学艺，终日胡缠。我为了克服教学上和创作上的困难，经常冒着北方刺骨的寒风，去西郊“万牲园”（今“动物园”）观察。把锦鸡身上各部分的羽毛的色彩默默地记下，回到宿舍里再精心地一针一线地绣出来。在绣人物方面，我常常暗地里注意别人的笑貌、动作、特征，最难表现的眼神……。常常对镜揣摩动作、表情，再摸索针法，在用线配色上加以推敲。常常向沈寿请教。但是，尽管我这么苦心钻研、耐心教书，在那里连一个人的生活也难维持下去。满清政府的腐败，旧社会的污浊世道，一个年轻姑娘，怎能单身混下去？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我就回到了家乡。

飘 泊

回乡后，那能找到事做。只好又向绣庄领点粗活。第二年才到苏州“私立武陵女子学校”当刺绣教员。在那里教了三个月，看到的哪像个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常以“劝募学校经费”的名义，不让教员们教书教绣，而叫我们专绣人像。让我绣了两幅洋人要的人像以及中国画水墨扇面册页。由

“校长”拿到美国教会里去高价出售。另外还拿我的绣品去国外展览，得大笔“奖金”。我气愤极了，就辞去了这个“名誉教师”的职务。又失业了。

一九一四年春天，我又只好离乡背井，到“上海城东女子学校”去教绣工课。课余绣了四幅人物画和禽兽画，被选去参加了一九一五年的“巴拿马太平洋展览会”。获得了奖章和奖状，但这是骗人的东西，把我的绣品骗走了，我却仍然贫苦得混不下去。教了两年书，却又失业了。

我又转到哈同太太办的“创圣女学”教绣工课。开始以为这里可能待遇高一些，日子兴许会过得下去。想不到比前两个“学校”更糟。这是一所披着宗教外衣的人间地狱。充满着封建专横的统治和毫无人道的残害。师生都没有人身自由，来往信件，都要经过检查。终年没有假日，只有佛教的所谓“旬假”。“旬假”日，未经校长同意也不准出哈同花园一步。不管你是不是教徒，一律要吃斋、进佛堂烧香拜佛。我在那里除了教绣工课外，还得给哈同太太绣佛像。其实那哈同太太那里是佛教徒，她常常和她的姘夫，拿着藤条打学生。有一个女生因祖母病危，想回家去看看，这位“佛教徒”却板起面孔，说：“你既已当了我的‘干女’，就不能再认前亲。”那学生不答应，结果被剥下衣服，在寒风刺骨的冬天被赶出了校门。我就是这个耿性子，看到这一切，气愤得再也住不下去，就提出辞职。可是，那校长却不准我把被头铺盖带出学校门。好不容易疏通了看校门的老妈子，我才算离开了这所“宗教学店”。



段伟君 插图

我刚回到苏州，正好接到沈寿从南通来信，要我去代她的课，因为沈寿已病倒。我立即奔赴南通。师生重逢，不禁热泪满眶。在南通没教几个月，沈寿病死。我看到南通官场的腐败，学校不像学校，整天把我禁闭在绣架下“卖艺”，十分愤慨。就这样饱经风霜地回到苏州。

生活逼着你呀！明知已经走了四所学校，天下烏鴉一般黑。但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见老母已经更老弱了，自己不得不再去寻找教书的职业。终于找到了“苏州女子职业学校”。想不到又是军阀齐燮元等人办的。我在那里又是担任“名誉教师”，实际上却被他们剝削，经常让我绣“贵人”们的像，作为“筹募学校基金”。

在这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我东飘西蕩的奔波，换了五所学校，到处一样受剝削、受迫害，一个女子怎么才能掙脱这个万恶的旧社会呢？我得不到答案。母亲说：“你年纪不小啦，不能再飘飘泊泊的过日子了！结婚吧！”

潦 倒

一九二〇年，我已三十六岁。经过二十多年风尘仆仆的生活之后，终于和一位在津浦路上担任工程师的张仙源结了婚。我丈夫为人耿直。可是，在旧社会老实人是要吃苦的。那时军阀连年混战，血腥镇压“二七”大罢工的工人。我丈夫虽不是革命者，但因为平时常骂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僚，也被他们借口“裁洗”了。那时他才五十岁，可就永远失业了。这，给我们多大的打击啊！

我们不得不从天津回到苏州。我又重操苏绣旧艺。而丈夫却闷在家中，心里十分烦闷，日漸积郁成疾。一天到茶馆去散心。不料就在茶馆里摔倒死去。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好比万箭穿心，慟哭得不省人事。老母帮我四处求人借了点錢，埋葬了丈夫。哪料到丈夫的尸骨刚入土，老母又病

逝了。

这个吃人的旧社会呀，真要把你的骨头都啃掉呢！两桩丧事刚办完，“女子职业学校”又停办了。我又失业了。……

在那兵荒马乱、日寇横行霸道的年月里：一个穷孀妇，到处寻不到工作，绣品被老板煞价。后来连绣庄的粗活也难领到啦。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反动派到了末日，绣庄一一倒闭。我再也找不到半件绣活。最后只好流落到上海去做女佣。那时，我终日伴随在炉灶旁，叹息、悲愤，我恨那反动政府逼得我无处求生。我气那绣庄老板、“学店”老板把我的精心绣品一件件地骗光。他们害得我不能再操那心爱的绣艺。我是多么盼望有朝一日能重拿绣针，重劈丝线，去绣出绚丽的江山、清秀的花卉……。可是，我不敢想，想又怎么样呢？我分明已经潦倒到了这等地步，还能企求什么呀！？

新 生

正当我万念俱绝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解放了上海、苏州！我重见了天日。想不到的是人民政府四处寻找我。中央轻工业部来信寻找我的下落，苏州市文联也在寻找我的踪迹。不久又接到苏州市人民政府的来信和汇款，要我尽快回到苏州去参加苏绣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我并当选为合作社主任。

当我第一天重新坐到绣窗下，捻线劈线穿针时，双手哆嗦，热泪盈眶，心里发慌。这不是艺疏日久而心慌，而是我

心里激动得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心里一直在跳，在感谢：“毛主席呀！我要再绣几十年。没有您，我金静芬早已死去啦！”

解放以来，新的生活，使我们艺人有了丰富的感情和广阔的创作题材。我绣了《插秧图》《采茶图》《养鸡图》《采菱图》和《鲁迅像》《屈原像》……。为继承传统针法，我还绣了《红楼梦金陵十二钗》《西厢记》……

一九五七年我被邀出席了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工作会议。我回到别离五十年的北京。一切都变了。后又到东北参观，看到祖国宏伟的建设：长春的自制汽车；哈尔滨的自制发电机；鞍钢的铁水在飞腾、滚流……这一切与我五十年前所见到的血腥屠杀，洋货倾销，王公大臣、军阀、财主的荒淫无耻……怎么能比？我们这是一个崭新的新世界！而这一切，都是全亏了党的领导，有了毛主席！

我回到苏州后，从心里热出的一股劲，一定要绣出一幅毛主席巨像。于是，我运用与创造了三十二种新针法，用了近百种彩线，精细地绣了四个多月，几乎每天绣到深夜，越绣越有劲，越绣越激奋。在完工的那天，我亲自上街，配上了一个好镜框。我说：“我要把它送到北京去！要送给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顿了一顿，她接着说道：在过去那个年月里，苏绣女工差不多都是这样熬过来的。有的女绣工比我还要苦得多。那时女工也很少，全县只有二千来人。现在，却已有八万女工。沈寿那时的针法，只有十八种。可是，现在，已经创造

了几十种！在旧社会我教了三千学生，却一颗艺术种子也没有撒下。今天，党选出了大批优秀的艺徒，她们个个思想好，聪敏伶俐，什么针法，一学就会，一定会大步超过老一辈的。现在，党指出文化革命的方向，号召艺术更好地反映工农兵的生活，推陈出新，我要坚决响应党的号召，争取下农村去体验生活……

当金静芬讲到这里，慈祥的脸庞上露出幸福的微笑。我觉得她好像一个老园丁，一个值得敬崇爱戴的老园丁。窗外，清风送来一阵阵桂花香气，浓郁馥芬，夹着前园绣工姑娘们悠扬清脆的苏州评弹演唱声和欢笑声，格外迷人。金静芬向我又说了一句：“你听，她们多幸福，她们是喝着党的奶水长大的！唱吧，唱吧，唱得多好听呀！”

泥 人 张

梁 刚

窗外的桃花像彩霞一般地盛开着。张景祜由护士同志扶持着，站立起来。凶恶的疾病曾经缠困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使他痛苦躺倒；在党的亲切关怀下，经过医生们的精心治疗，前后几次重大的手术和长期调养，终于把他从危险中抢救出来，使他重又站立起来了。春天的阳光明丽而温暖，泥人张又一次获得了新的生命。

青年学员们来看望他。谈到了下工厂下农村的生活实践，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塑造，彩塑艺术的创新……他静静地倾听着，感到无限欣慰。

要不是党，那还会有泥人张；又那会有今天彩塑艺术的新生！

在天津一带，人人都知道“泥人张”。说是泥人张在与人谈话的时候，用泥悄悄地在宽大的衣袖里捏对方的像，一会儿就捏成功了。这个生动的传闻，说的是张景祜的爷爷张明山。

张明山从小就跟着父亲捏泥玩具卖钱糊口，日学夜练，渐渐练就一手彩塑的好技艺。捏的是民间传说和古典戏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还有当时生活里面的人物肖像。泥人捏得栩栩如生，真切动人，大伙儿都喜欢看。就亲昵地称他叫“泥人张”，赞叹说：“泥人张把泥人捏‘活’了，只短了一口气儿！”据说那时，天津有个外号“海张五”的恶霸，将张明山找去替他捏像。像捏完了，他却存心耍赖，说捏得不像。张明山气愤地回家后，将它换了一副打扮，变成一个歪戴帽横瞪眼的流氓肖像，摆在北城根下的小摊上。“这不是海张五吗？”人们一眼就认出来了，立刻传了开去：“泥人张贱卖海张五”。海张五咬牙切齿，奈何不得，只好背地叫人将原像收买了去。泥人张成为大伙儿喜爱的民间艺人。

可是，万恶的旧社会给艺人的是什么呢？

因为家大口多，生活困苦，五十多岁的张明山拎着一个小白包袱只身离家，到北京去找个“饭碗”，捏些泥人出售。不料，泥人被一个满清贵族“殷贝勒”逛街看到了。这个贪婪专横的家伙，看到泥人有趣，立刻就红了眼，当即要找这个捏泥人的。一见张明山，“殷贝勒”眼珠一翻，吩咐道：“跟我上府里逛逛去！”不由分说，带到他家。一进他家，“殷贝勒”说：“你就不用走了，在这儿呆着吧。”就这样活活将张明山关起来。“殷贝勒”闲得无聊，就将张明山叫去，捏泥人供他解闷。他想要什么，就得捏什么。更气人的是，“殷贝勒”惟恐泥人张被人“夺”去，竟禁止张明山与外人见面，就连请假探亲也不准许。一天，“殷贝勒”领着一匹小红马来叫捏像。一个

小童仆送水不如他意，暴虐的“殷贝勒”勃然变色，拿起鞭子就打。打得孩子满脸满手鲜血淋漓。一声一声的鞭打，就像落在泥人张的心上。他忍受不了，走上前去按住鞭子。“殷贝勒”一裂嘴，“啪”地扔下鞭子走了。

封建贵族的罪恶，技艺被糟蹋，使泥人张异常忿愤。终于在一个深夜，借机逃了出来。

那散发出腐朽气息的王府官邸，就像伏在黑暗中张着血盆大口的狰狞野兽。一阵肃杀的寒风刺透骨髓。到处是陷阱，到处是囚笼，那里才是出路呢？

张明山回家后不敢久留。为了摆脱追寻，只得远走江南……

二

清朝垮台，没有贵族来找泥人张了。可是，逃不脱“同陞号”的圈套。

“同陞号”原是一个小杂货店。掌柜看中了泥人是块“刮金板”，就承揽了经销泥人的生意，索性立起专销泥人的“同陞号泥人庄”。这时，张景祜的叔叔张玉亭继承并发展了彩塑技艺。除了传统的题材外，他还以深厚的感情、细致的观察和准确的刻划，捏塑生动的《三百六十行》人物形象。在艺术处理上有详有略，以夸张的手法突出人物性格，技法娴熟、准确而简练。可是，家境贫困，无力自销泥人。同陞号的掌柜正是抓住这个把柄，施展手段，垄断了泥人的销售。将泥人张家变成同陞号的作坊。泥人张得按照同陞号的市場

需要捏泥人。泥人全部交由同陞号转售。同陞号在转手之间，牟取一倍以上的暴利。

同陞号盗名欺世，将泥人用同陞号的名义前去参加国际国内的展览比赛，曾经获得“巴拿马太平洋展览会”金奖等。将泥人张的声誉作为广告。

那时，泥人被外国商人带去日本以及欧洲和美洲等地。同陞号泥人庄前，铜铃叮噹，豪华阔气的马车来来往往。洋人在车上一踩脚，马车刹地停了下来。大鼻方腮的掌柜立刻满脸堆笑，点头哈腰，迎进店内。那掌柜一双深窝子眼珠贼溜溜地乱转，指点着满墙的奖状奖章，和两厢玻璃立柜内的各式泥人，凭着一套奸诈伎俩，作成一笔笔高利交易。于是，泥人张心血的结晶，便变成叮叮噹噹的银元，塞满了赵掌柜的腰包。

一年一年，繁华的估衣街上的同陞号里，掌柜由经营泥人起家，财源广进，盖起楼房，别开两处画店，放出许多“利钱”。穿绸裹缎，脑满肠肥。而在狭陋的韦陀庙巷里一间矮小的屋子内，张家四人日日夜夜拼命地捏泥人，却还不够养活一家大小，仍然贫困潦倒。泥人张的血汗，养肥了同陞号的掌柜。

而压在泥人张头上的，还远不止这些。在那黑暗世道，捏泥人的人到处受欺侮。送泥人到那些高门大第，只许从后门进出。官爷狗腿一看中了泥人，岂肯饶过泥人张。那时正当军阀混战时期。天津这块地盘，今儿你夺，明儿他占。三天两头，衙门旗号一变，大小官儿跟着更换一批。爪牙们为

了逢迎上司，少不了将泥人当“地方特产”去孝敬。于是，泥人张就遭殃了。军警不断上门，点这点那，还明令非得精工细作不可。有时不但得不到工钱，还得外带赔上玻璃外罩。有一次，一个新上任的“官员”大摇大摆来到泥人店，挑来拣去地买走了一件泥人。想不到过了许多日子，待他玩腻了时，又派马弁将已经陈旧了的泥人退回来，嚷道：“这是泥的。胆敢拿泥巴骗我银子！”逼着退钱给他。还有一个“大官”的“二小姐”生前爱泥人，死了以后，每年逢到“忌日”，就有官兵来店，说：“今天是‘二小姐’忌日，拿两个泥人去上祭！”同陞号也只得自认晦气。这些损失又有一半要转嫁到泥人张的身上。

沉静倔强的张玉亭愤恨已极，将满腔憎恨凝进泥团，以尖刻的夸张的手法，塑出一群狰狞丑恶的形象，对那些残害人民的恶势力进行无情的揭露。这组泥塑做成以后，哄动了远近，来看的人几乎挤破泥人张家的门。大伙儿一看就明白，指着它们一一辨认，原来捏的就是那些军阀、官吏、狗腿子、封建把头和流氓的丑像。泥人张表达出了劳苦人们心里的仇恨！

三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天津沦陷，处在鬼子铁蹄的蹂躏下。泥人张的苦难就更加深重了。

一天，一个穿着和服的日本商人来到泥人张家。花言巧语，以楼房、高薪、分红等等进行诱惑，企图骗他们到日本

去。泥人张，对那些侵略祖国残害同胞的鬼子怀着满腔仇恨，坚决拒绝了强盗的诱骗。

以后，泥人销路断绝，泥人张一家失去生计，只能靠当、卖、借、赊过日子。绞索般的“阎王债”越缠越紧。

每逢年“关”，一家大小还空着肚皮，债主却像苍蝇般上了门。张景祜张景福兄弟俩不得不离家躲债。万般无奈，忍痛从身上脱下几件衣物，去上当铺。哆嗦着递上当铺那又高又黑的柜台。不料“啪”地一声，随着阴阳怪气的一声“不——要！”衣物被摔到地上。苦苦央求，好歹当了少得可怜的几个钱，哪里够还债？一家老小饥瘦的面容、债主们的阎王似的脸孔，在他们的脑中晃动。凛冽的北风刮得浑身发抖。一步一步朝着冰冷的家里走去，思忖着又只好硬着心肠，另借一笔利息更高的高利贷来打发眼前的债主……

重重压榨，使张景福忧郁成疾，无力治疗，终于被夺去生命！

生活压得泥人张喘不过气。守着一盏昏黯的孤灯，泥人张祖孙三代人商量着出路。“泥人张……！泥人张……”生活的艰难，技艺的垂危，儿子的死，使老人张玉亭沉默得像块石头。他失神地蠕动着冻僵的嘴唇，只是囁囁地念叨着这几个字。一代一代费了多少心血，把泥变成逗人喜爱的东西，可是……怎不心疼欲裂。半晌，张景祜才噙着泪站了起来：“再捏泥人，只有饿死。”哽咽了一阵，抬起头来又继续说：“我的年岁大了，也没法改行。让下一辈的另谋生路，逃条活命去吧！”

为了生活，泥人张家的人已经一个一个出走了。这时，惟一继承彩塑技艺的张景祜的侄儿张铭，也心酸地放下心爱的泥团。于是，只剩下孤独的张景祜，捏些盒装泥人出卖，也难以糊口……

就连这样，鬼子汉奸也不会放过。一天，一群伪警察和特务气势汹汹地闯进泥人张家，说是敌伪政府的“日本顾问”要来“参观”。逼着居民们扫街净房。还将大街小巷“戒严”起来。一阵咯咯的乱靴声中，只见来了一个穿着军装满脸横肉的鬼子，领着一班爪牙。一拥进门，叫泥人张“表演”给他看。手下那批爪牙就往泥人架上乱翻，见到合意的就往腰里揣。分明是一场无耻的明火打劫。末了，那鬼子小眼珠一



权正环 插图

翻，朝狗翻译官咕噜了一阵，竟要泥人张替他捏下流的东西。张景祜再也不能忍受，站立起来说：“我们不作那种东西！”鬼子没有办法，一脚把泥人架子踹翻，悻悻而去。

每当拿起泥团，那亲切柔驯的泥土竟变得冰冷，粘得泥人张的手指发麻，心里发疼……

四

去了日本鬼子，来了“刮民党”。

一天，一辆黑乌龟壳汽车停在巷口。钻出来了一个穿着笔挺西装贼眉贼眼的家伙。盛气凌人地走进泥人张家，自称是“中央合作金库”的“要员”。胡诌瞎扯地把泥人夸了一通后，接着便说：“‘上边’很‘器重’你们的技术，准备办工厂制瓷人，要请你们到那里工作。不过还没见过你们的东西，先选些好的样子带去看看。……”最后，留下一张名片，叫泥人张作出些精致的泥人“样品”送去。

泥人张借钱买来原料，日夜赶作。忙了几十天，捏了不少“样品”，包装成箱送去。接收“官员”对泥人张说：“你回家等着讯吧！”可是，等了又等，盼了又盼，结果还是不见什么“讯”。待再去打听时，就连门也不让进了。从此杳无音讯。

“刮民党”和日本鬼子一样厉害。那班豺狼恶狗是不肯放过奄奄一息的泥人张的。今天，一个伪警察闯进来，嚷道：“呃！俺‘老太太’做寿，你给作个佛菩萨。怎么着，几时得？”明日，一个特务找上门来，嚷道：“喂！‘局长少爷’要交手工作业，让你给捏几个！”他们一进泥人张家，看着这个中意，拿

走；看着那个合适，拿走。泥人张饿着肚子，借钱买来原料作的泥人，就这样白白地给抢走了。

彩塑艺术，曾经浇注了泥人张们的多少心血！大伙儿喜爱它，泥人张心疼它。在最艰难的时刻，在忍辱含垢的时刻，他们总是怀着一种幻想，幻想着能有一个“国富民强”的时候，生活安定，好好发展彩塑艺术，捏泥人给大伙儿欣赏。可是，从“满清”到“民国”，一代一代，一件一件惨痛的事实将泥人张们的幻想彻底地摧毁了。捏泥人的人活不下去了。七十多岁的张玉亭躺在床上沉痛地叹息说：“先人的事业是保不住了！”

张景祜只能捏些小泥娃娃，用篮子提到街上去叫卖。钞票贬值，物价暴涨。卖几个钱那能撑得上一日百变的粮价！泥人张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辗转在饥寒交迫中……当时的报纸上登出这样触目的报道：“时代变迁艺人趋没落，泥人张技术将成绝响！”

旧社会，压断了泥人张的骨头，榨尽了泥人张的血，窒息了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生命！

五

东方升起了红太阳！

太阳照进了泥人张家。

天津市解放后不久的一天，一个头戴五星帽的人来到泥人张家访问，热情地握住了张景祜的手，将人民政府关于保护、发展和提高民间艺术的政策告诉泥人张，帮助他们解决

生活困难，安排工作。

泥人张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久，张景祜应邀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工作。张铭和久已改行的张景禧、张镇等重新从事彩塑工作。张玉亭也被聘请为天津市文史馆馆员。天津市艺术博物馆里开辟了“泥人张彩塑室”，收集几代泥人张的作品陈列，并展览新的彩塑作品。

党和国家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泥人张，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创作和学习条件。他们在宽敞明亮的工作室里舒心专注从事着艺术创作，他们去到各地参观访问，他们和艺术家们在一起研究切磋，他们向年轻的学员们传授技艺……这一切怎能不使他们感慨万分，深深感到由衷的幸福呢！泥，变得更富有生命力了；色彩，变得更充满感情了。泥人张用泥和色彩表达着对新生活的满腔热爱，在他们激情的手指间，诞生出一个又一个焕发着新生命的泥人来。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泥人张最难忘的一天，那一天下午，张景祜在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他在游廊里休息时，听到前面骤然爆发起春雷般的掌声。抬头一望，只见人群中一位魁伟的人健步走来，这正是日夜思念着的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啊！张景祜顿时感到全身热呼呼的，他兴奋地迎上前去，紧紧握住了最敬爱的领袖的温暖的大手，激动地说：“毛主席！我姓张，天津人，是个捏泥人的……”毛主席慈祥地微笑着注视着他，亲切地和他谈话，称赞他的作品作得不错……这时，真有千言万语涌上泥人张的心口。可是，张景祜却说不

出来。他只是激动地注视着主席慈祥的面容，幸福的泪水在眼眶里闪动。他久久地在想：“敬爱的毛主席！要不是您，那还会有泥人张！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新生命是党给的……”

一九五七年九月的一天，又是泥人张家一个幸福难忘的日子。张铭光荣地被接受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过去受着压迫与剥削的民间艺人，含着热泪在红旗下庄严地宣誓：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彩塑工作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捏泥人，就是干革命！

在党的亲切指引和帮助下，他们逐渐懂得彩塑艺术应怎样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们克服思想上的障碍，突破旧有艺术传统的束缚，努力创作现代题材的新作品，如张景祜的《泼水节》《东风颂》，张铭的《丰收之前》《踏遍山村》《大庆人》，张镇的《方向盘》《许云峰》，张景禧的《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等，受到观众欢迎。

六

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为彩塑艺术开拓了广阔的天地。党和人民关怀着彩塑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为了更好地培养新生力量和开展彩塑艺术革新，一九五九年九月，成立了“天津市泥人张彩塑工作室”。张铭、张镇和张景禧以及几十名学习泥人张彩塑艺术的青少年在那里工作和学习。在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设立了“泥塑工作室”，张景祜和他的青年学生在这里从事创作。

新一代彩塑工作者是在幸福中成长的。新社会为他们

提供了前辈所不能想象的优越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条件，党和人民亲切地培养和教育他们，关心着他们的成长。老师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地教导他们。而更重要的，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着他们，使他们明确了“为革命而塑”的意义，为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彩塑艺术应该反映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斗争生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成为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和打击敌人的革命武器。

他们坚定地遵循着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热情地创作反映工农兵形象的新作品，表现工农兵的生活和理想。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上前进。

他们遵照着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光辉指示，背着被包，一次一次深入工厂、农村和连队，参加劳动和斗争。

钢花飞溅的车间和麦浪翻腾的田野锻炼了他们，工人、农民和战士的强烈的阶级感情和崇高的思想品质教育着他们。使他们从内心深处产生出一股为英雄塑像的强烈愿望和信念。于是，他们满怀激情地塑造出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形象。如：杨志忠的《新轮下水》《武装起来》、逸金榜的《山里人》《当代愚公》、张乃英的《老师傅》《过去的农奴》、胡月景的《优质钢》、张宏英的《三代民兵》、王世伟的《草原民兵》、苏靖丽的《试题》，以及郑于鹤的《等着爷爷》、沈吉的《帆》等作品。他们也以强烈的阶级感情塑造了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如集体创作的《童工血泪》、杨志忠的《卖身契》、张鋈

的《我，朱老忠回来了》等。他们时刻关心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在彩塑作品中，不断出现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的英雄形象，如张宏英马玉兰的《奇袭战略村》、马秀娟白宝苓的《赤道战鼓》等等。并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漫塑”示众。

由于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占领了彩塑阵地，使彩塑艺术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彩塑作品受到千万观众的欢迎和赞扬。

今天，彩塑艺术已经超越“张”家窄狭的门槛，开始成为一支社会主义彩塑艺术的新苗了。

伟大的时代，使青年彩塑艺术工作者们感到深深的幸福和自豪。他们满怀着革命的雄心壮志，坚信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前进，是一定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攀登革命彩塑艺术的高峰。

让我们殷切地期待着！

忆 苦

师 陀

周坤福同志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上海市静安服装生产合作社的技师，在中装的设计剪裁方面算得上一位专家了。我到服装社去访问他，他个子不高，穿一套蓝布制服，不善于辞令，但是生气勃勃，从他身上看不出四十八岁。我们谈到他的出身经历，他怎么学到这一身本事的。按常理他不用思索就能回答我，他却绷着脸——显然他心里太激动了，半天才说：

“我家在常熟乡下，祖祖辈辈种田。我有哥哥、姐姐，我是最小的……”

现在请你试想，假使今天有这么一个农民家庭，他有父亲母亲，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是全家最小的——十二岁，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不错，他父亲务一辈子的农，对庄稼活有丰富知识；他母亲勤俭治家，能精打细算过日子；他的两个哥哥像铁打铜铸，是生龙活虎的好劳动力；他的姐姐已经中学毕业，也参加了生产；他自己该带着红领巾上小学四年级了。

这个家庭本来是应该到处受人尊敬的。可是在旧社会，却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那时候他们全家向地主租种六亩田，遇到好年成，每亩能收那么两担谷子，折合白米一担四斗，而黑心的地主用大斗收租，名义上每亩租米一担，实收一担二。这笔帐立刻可以算出来：他们劳动一年，全家六口，共挣得白米一百八十斤，每人每年三十斤！因此饥饿老像一条无情的鞭子，早上把他们赶到田里，夜晚又把他们赶回家。他们为了活下去，全家从早上忙到天黑，连顶小的阿福也不例外，他九岁就跟着大人踩水车了。他们不敢爱惜气力，只要有活做，什么都干。他们除了耕种那六亩租田，还帮附近的富农和地主们摇船，插秧，割稻，挑河泥……可是卖一年的命，换来的仍旧是半年吃糠，半年饿肚子。

今天连农村的青年人都不知道租田种是怎么回事了，你会说：“这岂有此理！”你会说：“不交他娘的租！”你会说：“不给他种田！”那好吧，在那个时代，地主们只会冷笑，因为法院是他们的，民团、警察、军队也是他们的，不交租你就坐监狱去，不种田你就喝西北风去。要知道他们种的六亩田还是祖上承租下来的，老害怕被附近的富农和经营地主给抢去，逢年过节，必须额外向地主送一份礼呢！

农村活不下去。就在阿福十二岁那一年，母亲百般想法子，最后托在上海的舅舅介绍，把他送给一家裁缝店当学徒。

“阿福呵，你在外面受了委屈，可别埋怨娘，都只为我们

穷，你爹一身的病，没有几年好活了。娘不盼你成龙变虎。你一个人要当心自己……在外面有一口饭吃，总比家里强啊！”他母亲让他穿上新拆洗的棉袄，送他上路，送他一把眼泪。

做母亲的心意不是几句话能说得完的。总而言之，她以为孩子有吃饭的地方，将来有出路了，她哪里知道小小的阿福到了上海，磕头拜师，竟把命运交给了裁缝店老板。那“关书”上分明写着：“生病死人，各凭天命。学业三年，帮师三年。中途辞退，照算饭金。”如果说这一张“关书”是卖身契，一只猫还该有代价，他是个人，却得白做六年奴隶。

尽管事情过了三十多年，周坤福同志说到当学徒，仍旧愤怒得眼睛都要弹了出来。

“讲明学业三年，其实是骗人的，头两年根本不许你摸针。你要是上心学，自己从旁边看一点，会一点；不上心学，一辈子也不会成个器。”

现在服装社也有学徒。他们每月有十五块钱的饮食费，三块钱的零用钱。我参观过他们的工场，他们每天工作八小时，在政治上跟干部和老师傅是平等的。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坐在成衣案或缝纫机前工作。他们的面色一个比一个的健康，他们穿的一个比一个的干净。其中有个男徒工，进场三个月已经会缝衣服了。这是当年的阿福梦想不到的。那时候他每天五点钟以前得爬起来，生煤球炉子，淘米烧饭，给老板倒夜壶、买点心；那时候他得给老板娘抱孩子，给孩子洗尿布，给老板买老酒和下酒小菜；那时候当然也没有什么伙

食费和零用钱，别人吃饭，他们得站在旁边侍候着，别人吃完了，他们围着灶台吃点残羹剩汤。那时候老板的规矩比皇帝都多，他睡觉以前不准学徒休息，不准他们说话，不准他们笑，不准他们坐，不管有没有活，都只能规规矩矩站着。老板每天晚上吃完老酒，照例出去赌博，要么上书场喝茶听书。你也许以为这时做学徒的可以透一口气了，但他们心里却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地担着心。假使老板输了钱，他们每人得挨一顿揍。因此每天夜里过了十一点，他们的心便揪起来。老板去听书似乎应该好些，可是有一回他们不当心，几个少年人正说说笑笑，老板回来了，一进门就拳打脚踢，还说：“你们倒快活！要快活回家去快活，算还我饭钱，都给我滚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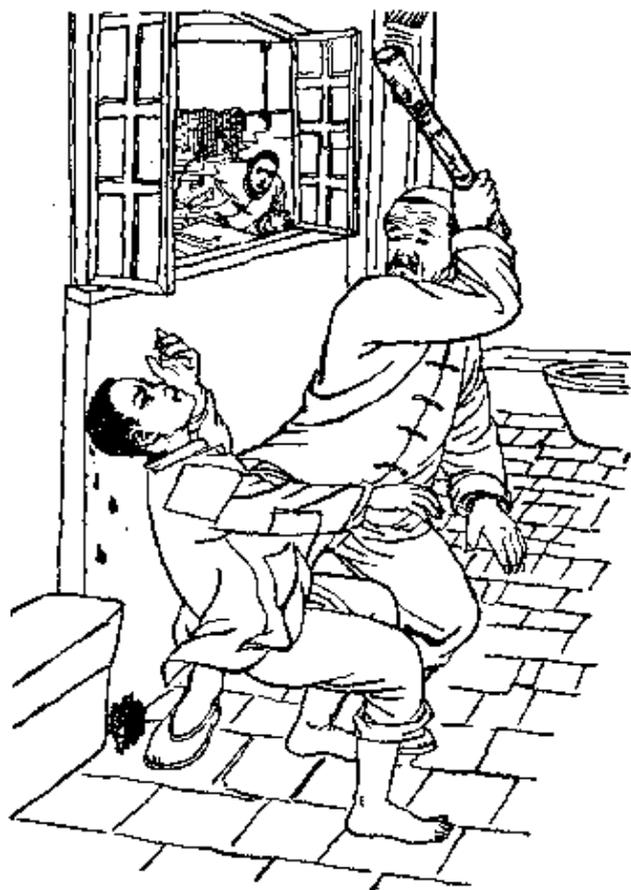
城市里只许老板快活，学徒快活是犯罪的，哭是罪上加罪。阿福在上海挨打受气，过了一年，有人从乡下带来口信，他父亲死了。

原来少一个阿福吃饭，家里并没有好起来。那年春天青黄不接，连糠都吃不上。他父亲自念是老佃户，地主可能看面子，才亲自去借粮。他已经病了两年，走两步歇一歇，好不容易挨到那里，谁知道地主非但不借给，反而将他打了一顿，还威胁着要抽租。先不说祖上，他自己就像牛像马做了一辈子，每年交七担多租米，一辈子共合要交多少米呵！现在他只要借几斗就行了，而且是要还的；可是，他挨了打。他越想越生气，勉强摸回家，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阿福听说父亲死了，哭着要回家。那老板说：

“人死都死定了，你回去看一眼，能活得转来？”

那时在小小的阿福看来，父亲一死，等于塌了半个天；再说他离家一年多，他有多少苦要向母亲诉，有多少泪要向母亲流啊！他正呜呜咽咽的哭，老板从灶间拿来一根柴棒，劈头盖脑打下来，头上被打了老大个窟窿。阿福只觉得眼前金花乱冒，天旋地转，倒下去什么都不知道了。幸亏有位叫蔡书生的师兄找来一块破布帮他包起来。他醒来满脸满身的血，地上也是血。



段伟君 插图

“你讲人情，你讲理，老板跟学徒是既无情也无理的。”周坤福同志说。“这个疤会在我头上留一辈子。当时我疼了一个多月，老板不要说给我治了，连一个钱的药都不曾买过。”

那么，老板娘是不是好点呢？老板自己是不做活的，而老板娘除了吃饭、睡觉，一天到晚在邻居家里搓小麻将。有个例子足以说明她刻薄的程度，那时候学徒只在每年过年过八月半时才有那么十五到三十个铜板的“节规”，可是谁也没有拿到过。她记的很清楚，哪一天你洗碗打破一只碗，要么哪一天你弄坏了什么东西，她把“节规”扣了。其实你打破的碗弄坏的东西早已还过，老板当时打过你，她本人罚过你不许吃饭，她都不管，在这一点上，她是跟老板分家的。

你也许以为阿福倒霉，遇见的老板特别凶恶。你在解放前的上海，冬天随时可以看见这种十多岁的少年：他们的头发老是很长，手上全是血口子，上身穿一件破棉袄，下身穿一条单裤，腰弓得像大虾似的，冲着北风，光脚踏着冰雪匆匆跑过。他们多半是各种行业的学徒。

阿福夏天睡在弄堂里水门汀上，冬天睡地板，每天站十八个小时，吃的是菜汤淘饭，过了三年，被折磨得不像人样，两条腿都瘫痪了。老板看见他不能工作了，又拉下面孔说：

“我是做生意，不是开养老院，要享福，你回家去享去！”

阿福不肯回家，自从父亲死后，租来的六亩田被地主抽去四亩，大哥只得出去做长工，家里更困难。他想着病是在

老板这里得的，应该由老板给他治好。老板哪里肯认帐！找来介绍人——他舅舅，摆出“关书”说：

“这只能怪你运气不好，‘关书’上头写的明白，‘生病死人，各凭天命’。你一定要死在这里，我没有话说，平白养你是办不到的。”

他没有法子，只好回家。他母亲看见孩子出门时是个好人，回来时成了残废，穷苦人是凭身体的，以后怎么谋生呢？不由的放声大哭，说：

“娘只以为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谁知道受这许多罪。以后娘再不放你出去了，要死，咱娘俩死在一块吧。”

家里也没有什么吃的，但是他不必每天站十八个小时，高兴时可以拄根棍子走出来。凑巧邻居有人会打金针，过了半年，病算治好了。老板得到了消息，怎肯放弃以后三年的剝削，立刻写信来叫他回去。他母亲说：

“生了病他不管，白给他做了三年，不管他！”

老板这时又找着介绍人——他舅舅，又摆出那张要命的“关书”说：

“这上头写着‘学业三年，帮师三年’，可没有说管治病。人不来也可以，按白纸黑字，把三年的饭金算还我。”

阿福被以前三年的生活吓坏了，不肯回去，他母亲舍不得放他回去，母子俩哭成一团。但是既然没有钱还老板的饭钱，哭来哭去，母亲最后还是横了心说：

“阿福，不是娘心狠，我们没钱还他，命苦身体挡，还是去吧。”

老板敲骨吸髓，共榨取了多少工人和学徒的血汗呢？除了前面说过的他恹恹意意去赌博、上书场听书不算，他每天吃的是蹄膀，吃厌了蹄膀吃鸡；天热他喝啤酒，天不热他喝黄酒；他在上海大放高利贷；他在老家大买田地，大盖房子。可是当学徒病了的时候，他却说：“小鬼瞎三话四！一顿吃两大碗，有什么病？泡碗明矾水喝喝。我教你们给吃穷了。”每逢过节要发给工人工钱时，他又说：“我今年算触了霉头，一点点家当都快赔光了。”

阿福又回到裁缝店。在这以前他是最小的学徒，他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老板手里，以后他亲眼看见，三个师兄弟在短短两年中送了命。首先死的是二师弟周阿林。周阿林冬天没有鞋子穿，一双脚烂的血淋漓嗒，有一天被穿着皮鞋的老板一阵乱踢，血像泉水般从烂脚里淌出来，只喊了一声救命，就断气了。接着死的是小师弟王林发。老板叫王林发做一条裤子，他从早上做到半夜十二点没有做成，老板赌钱回来，顺手抄起一根柴棒，直打得他皮开肉绽。老板打累了，丢下柴棒，声称明天再打，自管睡去了。王林发不过十二三岁，怕明天再打，下半夜在楼梯底下上了吊。他父亲得信从乡下赶来，哭得死去活来。法院派法官来验尸，老板当场塞给他六十元钞票，法官一句话也没有说，开了个准予埋葬的单据。

这就是旧社会！老师傅难道不同情徒弟吗？同情的，可是不敢得罪老板，怕“歇生意”。做学徒的不想反抗吗？想的。硬来只有自己吃亏，他们于是来软的，就在王林发死后，大师兄蔡书生找阿福商量逃走。阿福的确想逃走，假使世界上

有那么一条缝，是老板没有办法把他拉出来的，他会立刻跳进去。可是世界这么大，对他却又是如此的小，他没有钱，没有一个老板找不着的地方。蔡书生是孤儿，只有一个姐姐在上海卖青菜。在老板吃人不吐骨头的残酷剥削下，他本来已经到了肺病第三期。逃到姐姐那里，但是姐姐也没有力量抚养他，过几天只得又送回来。他死得更悲惨，一面大口地吐血，一面还得给老板做活。直给老板做到断气。阿福自己没有死是很偶然的，不过他也成了瘸子，好几年后两条腿才算复原。

他终于做满了六年。刁钻奸诈的老板早已打他的主意，教他请两桌“满师酒”。这两桌酒席花去他半年的工钱。因此，他连病倒的半年在内，十足做了七年毫无报酬的学徒。现在，他“自由”了，由谁都可以打骂的“阿福”改名为周坤福了，他有可能脱掉第一次离家时穿在身上的破棉袄了。他成了工人，换了新的老板。应该说谁都为他高兴。可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他只做了半年，春节一过，到了淡季，立刻被辞退了。他跟老板讲理，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跟工人讲理的老板，那家伙只无耻的冷笑着说：

“我要一百只狗困难，要一百个裁缝交关便当。”

其实他根本用不着讲理。他前后做了七年学徒，老板是怎样剥削工人的，他比谁都清楚。从此过了十年。他十年里头换了六个老板，老是半年做活，半年失业，从乡下贩甜芦粟来卖。一个裁缝工人在马路上卖甜芦粟，你现在想着是十分可笑的，而那时他心里有多苦呵！他做了七年学徒，差一

点把生命付出去，却不得不像叫化子似的站在马路转角上，等待着偶然来一两个小孩，照顾他一个铜板的生意。但是来的常常不是小孩，而是巡捕，他就得赶快逃。站在马路转角上，任何小流氓看不顺眼都可以踢翻他的摊子。在这十年里头，他受了多少侮辱，他心里积压了多少仇恨哪！

在这十年里头，他惟一的家当是一卷旧棉花胎；他身上的衣服经常在当铺里滚进滚出。

也就是在这十年里头，日本帝国主义来了，他二哥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他姐姐逃日本人饿死在外边；他母亲悲痛子女的不幸遭遇，加上担心一家人的生活，不久也死去了。从上海到常熟并不远，他连两块钱都借不到，没有法子跑回去，哪怕看上一眼。

他二哥后来总算逃回家。家里没有一粒粮食，靠他贩卖点稻草过日子。日本鬼子下乡打粮，要抢稻草。这点稻草是他们全家的命根子，他二哥不肯给，跟日本人打起来。他二哥身体很扎实，足足抵得上三个日本人，只因为没有枪，反而被打得七窍流血，给捺到水塘里。结果日本人不但抢去了稻草，连仅有的三间草房也给放一把火。全家从此四散。他大哥本来是在外边做长工的；他的两个嫂嫂逃到上海做了娘姨；他的侄子进裁缝店做了学徒；他的侄女在乡下送给人家做了童养媳。那个原来住着一份人家的地方，只剩下孤伶伶几座坟堆，以后就变成一片白地了。

假使江南不解放，那里将永远是白地了。解放以后，他大哥和两位嫂嫂分到了田地，他老婆和子女也分到了田地，

他感到自己彻底翻身了。根据已往从做学徒到裁缝师傅十八年的经验，他深知因为裁缝工人没有组织才受老板们任意宰割。所以手工业工会在上海一成立，他首先要求参加——他是第十六名，并且全心全意投身于组织工会的工作。他担任过工会小组长、组联会主任，前后共计六年。这对一个手工业工人是不容易的，当时裁缝店仍旧在老板们手里，按件拆帐，搞工会工作的就拿不到工资。

一九五五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服装生产合作社成立，他被选为理事，成立联社，又担任行政组长，一九六三年被手工业管理局提拔为技师。他的老婆和儿子是公社社员，他的女儿去年中学毕业，也参加了劳动，全家住的、吃的、用的，一应俱全。他本人原是文盲，经过在工会里学，加上跟邻居家的小朋友学，现在他已经达到初中文化程度了。

就他的大半生说，周坤福同志最忘不了的是上海解放，最激动的是他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说：

“没有解放，就没有我的一家。有人劝我让我的女孩子上高中念大学，我是个共产党员，党号召以农业为基础，我能不响应党的号召吗！我是个在旧社会吃尽苦受尽侮辱的人，现在不想着社会主义，我想什么！”

从街头到学院

石 毅

几十年前，还在人们被迫拖着辮子的时候，北京城里就出现一个结实的乡下人。他穿着破衣烂裤，背着箱子滿城走。看那里人多热闹，他就在那里放下箱子，摆好架势，捏起面人来。晴朗暖和的日子，他辗转在街头巷尾；滂沱的雨天，冰雪的寒冬，他瑟缩在市場门口或牌楼底下。一年、十年、几十年过去了，古老的北京城，换了几次朝代，还见这个人背着箱子滿城走。但是，他苍老了，并且越来越黄瘦，越来越褴褛，有气无力地在街头流连、熬煎！

正当他在死亡线上挣扎，北京城外炮声响了。共产党、新社会，使他新生，给他荣誉。他结束了五十年的街头生活，进了学院，当了教师。

这个人是谁？他就是著名的“面人湯”——今年已经八十五高龄的捏面艺人湯子博。

走上街头

湯子博原籍通州。小时一家八口，父亲是码头工人，两

个哥哥做泥水活，勉强维持生活。

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掠夺，满清政府搜刮压榨，这个小小的城镇，变得一片冷落萧条，满眼悲凉凄惨。做活有一天没一天，有一时没一时，一家人吃不饱穿不暖。他十四岁才入学念书，但只念了三个月，就失学了。

为了家庭生计，他跟哥哥去当小工。一天二百文钱，不够吃饭。工头还丧心病狂，专让青年工童工去拆危墙险屋，跌伤蹶死，一概不管。他一气不干了。

他提着小篮，上街卖花生糖豆。但年轻心直，不会算本计利，连本钱也亏光了。他无事可做，失业几年。

怎么办？他想起画画来。原来汤子博从小就喜爱画画，常常到街上去观看一位老艺人画扇面，回来模仿着画。日久天长，画得很像。他试着画了十幅八幅，上北京大栅栏扇子铺去卖。卖了几吊钱，除掉纸张颜料、行旅住宿的费用外，剩下的还不够自己吃饭。

走投无路，四处徘徊。一天，又看见一个外地来的捏面人，一刹那间捏一个，就卖十文二十文钱。他很高兴。原来汤子博不但爱画画，更爱捏小人。这里常有从山东曹州一带来的捏面艺人，他也经常站在旁边观看，觉得很有意思，就爱上了这门民间艺术。像着了迷似的，有空就和泥捏小人。有时还整天整天蹲在寺庙里，仿照佛像捏塑。但他从来没想到要以捏小人为生！今天，他才发现捏小人卖也是一条出路。他要试试自己的手艺，于是向这个艺人买了一点面，按自己画的人物捏，结果还细致生动。“好了！再不愁生活了！”他

想着，就回家把自己的打算告诉父母亲。

父亲不赞成，说这活儿是哄孩子玩的，无定着，没奔头。母亲却了解儿子的爱好和性格。没有别的路，不能眼看着受冻挨饿！于是母亲东借西借，凑足钱，让儿子做了一个木箱。

二十几岁的汤子博背着箱子，走上街头，开始了面塑创作生活。起初就在通州，不久到了北京。

当时北京已有几位捏面艺人，都是过着朝不保夕的困难生活。于是他背着箱子，离开北京，流浪外地。常常是在风霜雨雪中步行，在村旁街边露宿。买卖好时，吃顿饱饭，买卖不好时，饿着肚子。他出外几次，历尽千辛万苦，走遍了北方各地。河北、山东、山西、内蒙、东北等地许多大小城市的街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街 头 艺 人”

大海浮萍也有归宿，四十岁那年，汤子博结束了飘流生活，在北京结婚成家，定居下来。不久，生了第一个孩子。

流浪十几年，虽然饱尝风霜痛苦，却有机会在许多著名的寺庙石窟中观察研究了古代雕塑，从民间艺术中吸取了养料，扩大了视野，丰富了题材，提高了技巧。他以为，靠自己一手精湛技艺，可以让一家温饱了。但事与愿违。由于军阀混战，政治黑暗，街面上不是冷落萧条，就是恐慌混乱，买卖很不好。生活逼得他一度忍痛放弃捏塑，在面里掺糖，用模子做了各式各样的糖人糖鸟、糖牛糖马，到糖果市摆摊或

沿街叫卖，哄哄孩子。“面人湯”变成了“面人糖”。夏季昼长人多，还能卖几个錢，勉强糊口，一到冬天，就得挨饥受冻。

有一个叫李道衡的，是天津“实业厅长”，搞了一个“手工艺展览会”。为了点缀门面，把湯子博的面人也搜罗进去。当时的“总统”黎元洪看了展览之后，叫人把捏面的人找来，装点装点客厅。他到那里，辛辛苦苦做了三个月，结果，只拿到少得可怜的“工资”。

这一回湯子博的名声传进了“上层社会”，有人来請他捏面人了。

先是一所“慈善”学校叫他去教学生做手工，捏小人。这所“慈善”学校，当头的肠肥脑满，衣冠豪华，而学生却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他每月只拿到微薄的工錢，不够一家人吃喝。晚上和假日，还得背上箱子，到街头捏卖，才能勉强糊口。年终，学校要表表“成绩”，借来一批好衣服给学生穿上，把他捏的面人泥人充当学生的手工作品，陈列出来，然后把捐主請到学校参观，又是吹嘘，又是募捐。他非常气愤，辞职不干了。但他们舍不得撒手，还要来找他捏，说按个论价给錢，他宁可挨饿，也不願意再给他们捏，就故意抬高价錢，面人一元一个，泥人两元一个。这样才把他们推开。

后来，他又被請到一个综合性的试验所捏塑陶瓷。他精心塑造了许多逼真的作品。一次，官员来参观。试验所人员偷梁换柱，把他的作品摆出来，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博取上

司的“好评”。湯子博无法容忍，要冲进去揭穿他们，要和他们当众比比。他们连推带骂，把他赶到后边：“你是个穷工人，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化的洋錢堆起来比你还高呢！”不久，他被解僱了。

他看透了，也恨透了。发誓再不去当差做事，宁可背着箱子，走到街头，熬煎！

一天，他正在街头焦虑地等待顾客，一个鬼头鬼脑的人走到跟前，斜眼看了一会，说：“有位官长因为兵荒马乱，不敢让爱子出外念书，想找个人在家教教手艺。住的是洋楼，工錢不少。”问他願意不願意。

替人教教孩子，如果能让一家温饱，还是可以的，他答应了。

“好，那明天就去，到租界……”

“什么！到租界给洋鬼子做事？”

“不，是孩子住在租界！”

一提起租界，想起洋鬼子，他心肺就炸。他年青的时候，亲身经受过外国侵略者带来的痛苦，亲眼看见过洋鬼子的暴行。当时，通州是北京地区义和团活动的一个中心。二十挂零的湯子博，也参加了义和团。他曾手执大刀，随大队到北京围攻西什库教堂。许多伙伴死在洋鬼子的枪炮下。后来，八国联军入侵，滿清政府卖国投降，残酷镇压义和团。他们被解散了。他回到家里，才知道在外当杂工的小弟弟被八国联军杀害了。这样的家仇国恨，他永远不会忘记。现在，怎能到洋鬼子的地方去做事呢！能把孩子放到租界的人，也

不会是好人的。他忿然拒绝了。

人们见他老在街头，就称他“街头艺人”。

街头上的遭遇

湯子博已年过半百，并且有了四个孩子，家境越发贫困。城里没有生计，就搬到永定门外住。他每天清早空着肚子，进城捏卖，摸着黑回家。妻子女儿替人做绣活，孩子们去挖野菜，拣柴火。一家六口，穿的破破烂烂，吃的野菜稀粥。

不久，日本侵略者在芦沟桥头发起进攻，蒋介石卖国投降。北京沦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了。

因为每天早出晚归，受鬼子搜查，很危险，一家人又搬回城里住。

鬼子和汉奸横行，烧杀虏掠，无所不为，苦难笼罩着北京城。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有人死在街头。面人买卖更不好了。大孩子好不容易在一所学校当了杂工，但还不能养活自己。小孩子光着屁股赤着脚，拣破烂、碎玻璃卖。大人小孩挣几个钱，买“混合面”豆皮、豆饼、豆腐渣吃，里面掺着棕毛、头发、花生壳、小木棍之类的东西，也吃不饱。经常到垃圾箱里去拣烂菜帮、果皮充饥。一个个骨瘦如柴，肚皮肿胀得像鼓一样，冒着青筋，不像人样。

由于饥饿寒冻，胡拣乱吃，妻子、儿女全病倒了。他白天捏面人卖几个钱，买回一点豆腐渣，还不够一人一口，那里谈得上医病吃药呢！姑娘病得最厉害，已经瞪着两眼不会说话了。他一急，把家里的破桌破凳、书籍画稿卖掉，带着

姑娘去看病，捎回一副药。但大家都是害同样的病，怎能光救女儿，让妻子儿子等死呢！他流着眼泪，把一碗药分给几个人喝，每人喝几口。晚上，寒风从门缝墙缝吹进来，几个病人只有一条破棉被，拉来扯去，怎样也盖不住，在床上辗转呻吟。他看着心如刀割，只好盼望天亮，但是熬到什么时候才能天亮啊！

天亮，妻小还在床上哆嗦，要他看顾。但守在家，再没有吃的，不是死得更快吗！他把心一横，背着箱子出去了。

冬晨，寒风刮起一阵阵雪花，冻得彻骨刺肉，已近晌午，街上还是冷冷清清，偶有几个行人，也是藏头缩脑，匆匆走过。谁会顾到，在街头，有一个饿着肚子、穿着破衣的人，用冻僵的双手战抖地捏着面人呢？又谁知道，他家里还有几个病人正在死亡边缘挣扎呢？

他极力支撑着，用绝望的眼光看着周围。忽然，一个日本人带着两个孩子向他走来。要是平常，有日本人来买，他收起面人，背起箱子便走。而今天，他却站着不动。一家人性命在等着呀！

“面人的，照我们三个人模样，一人做一个。”日本人用手指指自己和两个小孩：“做好的，大大有赏。”

他只要动几下手，一家人就可以有口吃的。但他看这个日本人的神情装束，准是个什么“文官”。不管是“武”的“文”的，都是侵略中国的强盗。过去西洋鬼子想瓜分中国，现在东洋鬼子要灭亡中国！他眼前浮现了一幅一幅鬼子暴行和百姓悲惨遭遇的情景。新仇旧恨，一齐迸发，使他忘记了饥寒

病死，大声说道：

“我只会捏中国人！”一边说一边收拾箱子。

他抬起头向前走，但，该怎么办呢？妻儿还活着吗？想到这里，他心惊肉跳，加快步子，急急往家走。回到家里一看，妻儿稍好一点。但拿什么给他们充饥呢？看见还有一个妻子做绣活的小绷架，急忙拿到木铺卖掉，买回点小米煮粥，给几个病人喝下。……

有一次，他在东四街头，捏了一个《郑成功》，有人开口问价钱，要买。突然，一个伪宪兵冲过来，恶狠狠地说：

“喂，老家伙，不准做这个！”

“这是古代人物，我靠做这个吃饭！”

“做这个，要你的脑袋！”伪宪兵吼叫起来，一脚踢翻木



严华插图

箱，一手抓住他的胸襟。

人群哄动了。“你也是中国人呀！”“中国人捏中国人，怎么会犯法呢？”“你不喜欢中国人，叫他下次不捏就是了！”众人讽言讽语，伪宪兵不得不松开手。这时，已近中午，家里还没米下锅，一家人焦急地等着他做了买卖捎回点吃的。但老不见回来，孩子就到街头去找他。孩子懂事了，见情势不好，连忙帮着他收拾箱子回家了。

在街头流連熬煎

前门驱虎，后门进狼。日本鬼子投降了，却来了“刮民党”。富人还是一样富。市场里外一样灯红酒绿，大楼上下一样纸醉金迷，粮店那个老板一样皮袄戒指……

湯子博怎么样呢？

他大儿子当了印刷工人。一个姓张的商人向他定做面人。他以为生活可以好转了。可是大儿子当工人，工资本来就低微，又迟发晚给，扣这扣那，每月钱拿到手，只能买回二、三十斤棒子面，还不够自己填肚子。

那商人是一个奸诈的出口商。定做面人，言明一千元伪币一个。先付了一笔钱，然后却提出各种苛刻条件，什么质量不好呀！外国人不满意呀！逼着降价。并说面人坐飞机出口，运费贵，亏本，要他把同样大小的面人做轻一些，否则不收。他苦想出一个法子，里面用菜叶，干了之后挖出来，做成了很轻的空心面人。这样做又费时又费工，一天捏不了几个。加之通货膨胀，粮价飞涨，起初捏十个面人能买一斤

棒子面，不久，要捏二十个三十个才能买一斤。要那商人涨钱，不肯。想不做吧，又已经花了人家的钱。最后，要做五十个面人才买一斤棒子面，连本钱也收不回来。

保甲长也找上门来了，说他大儿子“中签”，要去当兵。

“我儿子不在家，怎么会‘中签’呢？再说他在外做工，也不能去呀！”

“人不在家，户口可在家！”保甲长鬼眼一眯：“不能去，也可以，买个人顶替，二十万。”

这明明是敲榨勒索。上那里讲理？只得卖这卖那，东借西借，凑足钱给保甲长。这些贪婪无厌的家伙，过了不久又来了，说买的那个人跑了，还得出十万元再买一个……

啊！穷人还是一样穷。一家人还是饥寒交迫，汤子博还是穿着破衣烂裤，在街头熬煎！

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激荡的学生反美游行队伍，又感动又痛快，觉得学生也替自己出了一口气。于是在东四街头，捏了个反美游行的学生形象。不巧，叫国民党宪兵看见了，把他带到岗亭上，声色俱厉地盘问他为什么捏这个？他说：“不为什么，我看见什么新鲜就捏什么。”宪兵眉竖眼瞪：“这是学生胡闹，影响我们和‘盟邦’关系！不许捏，再捏这种东西，就把你抓起来！”把他大骂一顿，并禁止他在东四附近捏面人。这样，他更没有活路了。

城里其他几个捏面人的，为穷困所迫，早就改行转业，去拉洋车、做小买卖或是流浪他乡，逃亡外地了。这时候，只剩下汤子博，也像叫化子一样了。他也曾几次想改行转

业，但又几次打消这个念头。“如果我也丢下箱子，离开街头，我这手艺便断根绝种了！”他疼爱面塑艺术，舍不得抛开它，这是他五十年眼泪血汗的结晶呀！

他盼望有一天买卖会好起来，过个好日子。他盼望自己的技艺流传下去。他盼望……

但是，那一天才是苦难尽头呀！

“我老了！不行了！盼不着了！”他绝望地叹息着。

从街头到学院

好日子终于来了，但不是因为买卖好了，而是因为共产党来了！解放军来了！

孩子们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人都说：“穷人翻身了，劳动人民做主了！”这些话多么新鲜呀！他快七十岁了，只知道“皇帝”变成“总统”，当官的换了一批又一批，只看见刀剑变成枪炮，去了日本鬼子来了美国鬼子。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穷人能翻身，劳动人能做主……

他照样背着箱子，走到街头。街头换了一幅图景。宪兵、伪警察、保甲长不见了，粮店老板卸了皮袄戒指，商店里的价牌不动不换了……。最使他痛快的是，外国军队全滚蛋了。

大儿子回来说：工厂里的把头全打倒了，资本家要听工人的话了！

老家来说：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全打倒了，农民分了房屋土地！

翻天覆地，换了人间！他喜笑颜开，忧郁了几十年的面孔从此变成了欢容！

不久，他听说，北京许多已临绝境的手工艺生产纷纷恢复了，人民政府正在组织各行各业的艺人归队。他欢欣鼓舞，但又纳闷：一个“街头艺人”，既没有到过工厂，又没有进过作坊，属那个行业，归那个队呢？

正当这时，他接到人民政府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一封信，介绍他到中央美术学院教书，教捏塑。他乍一看，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个受尽了剥削歧视、在街头熬煎了五十年的穷手艺人，现在成为大学教师了。在旧社会，连做梦也想不到呀！他拿着介绍信，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热泪夺眶而出，走到毛主席像前，鞠了几个躬。

接着，他参加了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并被聘选为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列席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

一九五二年，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美协请他做了一批作品送给会议代表。数十年来辛勤劳动的成果，能为反帝斗争服务，使他万分欣慰。

一九五六年，他调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院为他建立工作室，供他从事创作和研究。他培养了徒弟，教了学生。艺术回到人民之中，自己有机会研究艺术，并且后继有人，他的心愿实现了。

一九五八年，当他得知他的作品要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时，心头乐开了花。过去，他的作品出国，是供

国外有钱人玩赏，肥资本家的肚肠。而现在他的作品则代表人民去为祖国争光。

虽然已年过八十，但想起过去和现在，他就浑身是劲，日以继夜地创作，耐心地传艺。他从来不让别人帮忙，自己劈柴、弄煤、生火，自己扫地抹桌。人家劝他：年老，该休息一下了。“我不能让别人侍候。”他回答说：“我从街头到学院，是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不能忘本呀！”

他大儿子解放后进了工农速成中学，又在北京大学毕业；现在已参加工作了。二儿子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学习。三儿子在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后，现在建筑公司工作。一提起往事，他就激动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汤子博一家！”

一九六二年，汤子博八十二岁了。在饱尝了旧社会的辛酸苦辣，又为新社会贡献了十年的创作精力之后，他得到党和政府的照顾，在家作长期休养了。

他没有闲着，常常出席各种会议，关心国家大事，学习政治理论。当他看到党发出文学艺术创作革命化的号召时，兴奋异常，决心以现代戏剧人物作为今后创作的主要对象，并写信给文联和美协，要求下乡，为工农兵塑造。因为年迈，没有被批准。他就鼓励儿子下乡，说：“要记住咱们过去的苦，好好听党的话，为工农兵服务，做革命的接班人！”

两 种 生 活

柯 楚

一

北京景泰蓝老艺人张殿洪小时家住昌平县半壁街村。爷爷和爸爸都是给地主扛长活的。一年到头，披星戴月，汗流在地里，泪咽在肚里，种出的粮食送到地主仓里，养肥了地主，自己一家大小却挨饿受冻。从他记事那天起，就跟着妈妈，挎着篮子，到处奔走，到处讨饭。从东村走到西村，白天走到黑夜，春天走到冬天。有一次，正是冬天，白雪掩盖了山野，他娘儿俩冒着刺骨的西北风，想去讨一口吃的。不料地滑人饥，冻僵在二里外邻村的一个井台旁边，幸而被一位出来打水的长工看见，将他们搭救到破庙里，找了点干柴杂草烧起火，才将他母子救活过来。

讨饭要来的残羹剩饭养不活自己，更养不活一家五口，只好挖野菜，剥树皮吃。有一个荒年，野菜和草根都被挖尽了，树皮被剥光了，春天到来，地不长草、树不开花。这样，他爸爸带着全家逃荒到了昌平县城。

全家住在財神廟里的戏台上。爸爸给人家打短工，妈妈给街坊邻居縫縫补补，收入很少，哪里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呢？有一天爸爸做完工，喝了一点酒跑回来，抱起他六岁的妹妹就往外跑，一面流着泪，一面说：“儿呀！爸爸对不起你啊！”他以为是爸爸喝醉了酒，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妹妹了。

卖了妹妹，爸爸又带着全家到了张各庄，给地主看守場院，一家四口仍然吃不饱。

在他十一岁那年，爸爸妈妈含着泪把他卖给十几里外的地主家去干活。地主拿人当牛马使用，拿小孩当大人使用，从早到夜不让休息。陪着牲口睡，陪着牲口吃；牲口休息，他还要上几十里外的山上去打柴、割草。山上有野兽，狠毒的地主是不管的。一点事儿不称心，拿起扁担就是一顿毒打。十二岁的孩子怎能受得了呢？年底，在一个只有星星陪伴的黑夜，他偷着跑回家了。

他爸爸害怕地主来要人、追錢，就到处为儿子找藏身之所。这时，恰巧北京城里景泰蓝作坊招收学徒。为了躲开地主，有口饭吃，就把他送去了。飢餓的生活使他选择了从事景泰蓝手工艺的道路。

二

骨瘦如柴的张殿洪，穿着一件借来的旧布褂，跟着一位乡邻离开了家。爸爸妈妈送他到村边，流着泪说：“儿呀，你只要混上一顿饱饭，就回来看看你的爹娘。”这句话，深深

地印在张殿洪幼小的心灵里。

他被领到古老的北京城，交给了一个景泰蓝作坊的掌柜。

谁知，掌柜和地主一样狠毒。作坊里有几个年龄和张殿洪差不多的穷孩子。他们整日忙个不歇，还被掌柜任意打骂。每天天还没有亮，掌柜就破开嗓子大喊：“快，快起来干活！睡死啦！”起晚一点的，就被掌柜大骂，拳打脚踢一齐来。到了深夜十二点，奸诈的掌柜还要把时针拨回一个钟头，拼命延长学徒的工时。由于长年累月缺少睡眠，白天坐在一张又狭又长的木板上做活，常常打盹。只要给掌柜看见，抽起那块坐着的木板就打，有时把木板打成两截。

作坊活像“鸽子笼”。中间放着一只比汽油筒稍小的焊炉，满屋熏得乌黑，活像“烟囱”。他们白天聚在“笼”里干活，晚上就挤在里面的吊铺上睡觉。臭虫、跳蚤、虱子把他们咬得满身疙瘩。夏天受炉火烘烤，煤烟、汗水混合着流下，浑身是黑水。夜里无法睡觉，只得搬到院子里。院子里的蚊虫、百灵子也不饶人。夏天熬过去了，冬天的日子一样不好过，常常被煤气熏晕过去。

手艺没人教，学徒只有偷偷地学，靠自己刻苦努力，日长时久，慢慢地摸着些门路。有一次，他用蓝、黄色点了“凤凰戏牡丹”，不料被掌柜看见，怪他用多了价钱贵的颜料，拿起鸡毛掸子劈头劈脑就打，打得他头上起了疱。

每到腊月十五，掌柜就分配下来一个月的活，要年前交货。要是年底赶不出活来，不是打就是克扣饭钱。只得没日没

夜地赶。春节到了，但那是什么节日啊！春节变成了工人、学徒们的“困日”。

他们一年到头，吃的是窝窝头、杂面糊糊粥和腌菜。穿的呢？夏天一条破裤子混过去了。冬天掌柜穿上了羊皮大袍，学徒只穿一件破烂的夹衣，有时穿上破棉袄，棉花套子也是滴溜嘟唧地活像绵羊尾巴，尽是大窟窿小眼儿，根本不能挡寒。

说是学徒三年可以满师，但他熬了四年半。心想：苦日子熬了几年，可以凑点钱回去看看爸爸妈妈了。谁知和掌柜一算帐，不但拿不到钱，还欠了他的“债”。原来活少停工时的食用，以及买了几件旧衣服的钱都算是欠债。掌柜冷冰冰地对他说：“你要回去么？债还清，可以。”他像牛像马干了十几年，“债”也没还清。后来，这个作坊要併给大作坊，才放他走。

这时，他已经三十二岁了，技艺已比较熟练。他以为出了牢笼，只要有点技艺，是可以混个温饱的。活儿总算找到了。但干活时间依旧那么长，工资少，还不够饭钱呢。他要求增加工资。掌柜说：“景泰蓝卖不起价钱，不扣你们的，老子一家大小喝西北风么？”张殿洪愤然离开了。

由于他刻苦磨练，手艺较高，在景泰蓝行业里有些名气了。一家姓孟的景泰蓝作坊找他去烧焊。烧焊的就要管理学徒。张殿洪饱尝了学徒痛苦，不肯让自己的兄弟受苦。他不但不肯打骂学徒，还护着学徒。掌柜恼火了，把他逼走。

日寇占领北京的时候，景泰蓝作坊绝大部分关闭了。他仅

有的几件衣服也卖光了，光着脊梁，住在财神庙里的戏台上。有一个景泰蓝工厂的老板招工去东北，他应召了。那里的徒工每月有两元津贴，但就这一点儿也被工头克扣。有一次，一个学徒在外面吃了一顿饭，也算犯了法，被工头打得头破血流，满脸是伤。受苦人怎么不心疼受苦人呢，他愤怒地向工头质问，一直闹到资本家那里。他提出条件：工头也要干活，徒工的津贴不能克扣。否则就不干了。资本家因为他的手艺高，怕他走，勉强接受下来。



王雁插图

日寇禁止铜器生产，这个厂停办了，他又回到北京。

好不容易到“瑞祥生”景泰蓝作坊当上工人，离春节两个来月，掌柜借口淡季买卖不好，把他辞退了。他只好到东直门桥头上的“人市”上去卖苦力。不久，到一个铁工厂当临时工。在腊月廿九那天，铁工厂的资本家对他们说：“今年买卖不好，临时工全要解雇，发不出工钱，每人发几条带鱼算作工钱。”张殿洪提了几条带鱼，没家、没锅怎么吃呢？他拿着带鱼到一位同事家，顺便想借点钱，谁料那位同事也没吃的，哪儿有钱借给他呢！他留下带鱼，就走了。听人说，大同市好找事。好歹借到一点钱，买了一张火车票，大年三十下大同。一到大同就给日本鬼子抓去当“劳工”。他乘机偷跑出来，到宣化当了一年苦工，又回到北京。

日本鬼子走了，来了国民党。他在一家只有几个工人的小作坊里做临时工。物价一天数涨，拿到的钱还是不够吃饭。一九四八年年底，他又被掌柜辞退了。屈指一算离家已经十九年，他心里还一直记着那句话：“儿呀！你只要混上一口饱饭，就回来看看你的爹娘。”可是，十九年来，他一直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现在又失业了。穷苦人在旧社会里的生活道路啊，越走越窄。好手艺又有什么用呢！走投无路，他只得回到家乡。

三

家乡解放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斗倒了地主老财，他家分到了土地房屋和农具。从此结束了一年到头挨饥

受冻的悲惨生活，走上了幸福的道路。

第二年，他又回到了北京。三十九岁时和一个在旧社会受尽苦难的妇女建立了家庭。

党和政府领导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过去长期失业、改行的工人都归了队。张殿洪和几个同伴，欢欣鼓舞地参加了琉璃生产合作社。

合作社刚刚成立，资金少、设备简陋。几十个社员挤在一间小厂房里干活，晚上用草垫子铺在地上睡觉。三个月没有发出工资。张殿洪认识到自己是合作社的主人，这是为集体，也是为自己干活，和过去为资本家干活有本质上的不同。有党的领导，只要大家齐心，暂时的困难，很快就会过去的。有一天，他去动员一个还在小业主家干活的工人入社，那个小业主却把他缠上了，带着讽刺和挑拨的口吻说：

“这回你参加了合作社，怎么样呀？挣得多了吧？唉！凭你这手艺，要是不在合作社……”张殿洪识透了他的诡计，听到他中伤合作社，气火了，腾地站起来：“挣钱少，我乐意，再少一些，心甘情愿！你说这些没用。”小业主死皮赖脸地说：“我这是为你好……”张殿洪抓紧拳头，斩钉截铁地说：“我不需要你这‘好’！”几十年来的生活经验使他清楚地认识到：什么人需要合作社。他将整个心交给了合作社。

烧焊工序不能按件计工资，责任又重，他不计较这些，毅然挑起这个重担。张殿洪用高度的责任心对待工作。他总要比别人早上班，晚下班，从不迟到早退。一心一意在他那个露天的苇棚里精心烧焊。一有空隙，瞅着哪儿需要就奔到

那儿。一个冬夜，他从家里休假回北京，没有买上火车票。他想，如果等下一班火车就会迟到，影响车间的生产。于是，就冒着刺骨的寒风，连夜赶几十里路回到北京。第二天仍精神抖擞地按时上班。谁会想到他曾步行了一夜呢！

他一点一滴地为集体节约。煤渣里那怕有指头儿那么大的一块煤核，都检起来；废铜皮也一点点、一星星积聚起来。

他忠心耿耿为集体，深得群众爱戴。一九五四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一九五五年评为劳动模范，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六年又获得“艺人”的称号。永生难忘的是，一九五六年，他被聘选为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列席全国政协会议时，在怀仁堂的宴会上，见到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毛主席和其他首长同他们一一握手。坐在宴会席上，他异常激动，想到自己在旧社会受的苦难，想到今天……他站起来，走到毛主席的面前，举杯说道：“敬爱的毛主席！我代表北京市第一珐琅生产合作社全体社员，祝您身体健康！”在这简单的一句话里，包含着多少难以抑制的激情啊！他下决心：对党，对国家，对劳动，要永远付出一切力量，克服一切困难！

他虽然五十多岁了，但干起活来，像猛虎一样。他解决了景泰蓝“十蓝九砂”的老大难问题；想了许多办法，改进了景泰蓝烧焊工艺，成倍提高了烧焊效率。一九五九年，他承担了制作国庆十周年献礼品的光荣任务。五尺多高的大型制品，是景泰蓝工艺历史上没有见过的。怎样烧焊呢？想到是

向党向祖国献礼，他充满了勇气和信心。团结了老艺人和工人，发挥了冲天干劲，设计了一个一丈多深、八尺直径的大地炉。用土吊车操纵制品烧焊。八百多度高温的炉旁，熊熊的炉火，带着石棉手套也还烫手。他守在炉边，运用着熟练技巧，眼明手快地进行操作。他们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终于制成了精美华丽的“龙头虎耳罇”和“金鱼缸”，为人民大会堂增添了光彩。

党分配给他青年学徒，要他培养接班人，这件事使他特别感动。他经常把旧社会与新社会对比，教育这些青年学徒，“身在福中要知福！”鼓励他们建立革命思想和学得过硬本领，作革命接班人。他传艺十分认真，讲关键，教细节，边做边教。青年学徒说：“张师傅恨不得把肚子里的本事一下子都掏给我们。”现在，合作社已经变成工艺美术工厂，盖起一幢五层大楼。青年徒工们迅速成长起来。一切都在迅速地发展着。张殿洪十六年如一日地在他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保持和发扬着工人阶级的本色。

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张殿洪是有深刻体会的。他深深懂得幸福是怎样得来的，他要为社会主义贡献全部力量。

无形的鎖鏈

江 川

結婚是喜事，可是在舊社會，北京雕漆藝人劉春林却因為結婚，被縛上一條無形的鎖鏈。這條無形的鎖鏈，把他整整捆縛了十七年，使他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健康，失去了七個親生的骨肉……

熬過了幾年學徒和幫工生活，劉春林有了一手技藝。可是，找不到活干，只能給大作坊做加工活，一天掙三兩毛錢養活父母。有活時，勉強度日，沒活時，餓着肚子。一天，資本家李增永來到劉春林的家，裝得很親熱地說：“春林，我辦了一個雕漆局，你到我那裏做活吧！”李增永一副瘦猴臉，有錢有勢，陰毒奸詐，是有名的“小雷公”。劉春林不願意給“小雷公”做活，“小雷公”却甜言蜜語地說：“去吧，去吧！我是你‘師叔’，絕虧待不了你。”原來，“小雷公”看中了劉春林是個掌握全盤技藝的師傅，說盡好話，非要他去不可。劉春林被纏不過，又看到做加工活有一時沒一時，生活沒有保障，不是長久之計，于是就答應了。他想：不適合可以走。

“小雷公”每月只給劉春林八塊工錢。劉春林一算還不如

在外面做加工活，就提出要走。“小雷公”增到十块钱，还假惺惺地说：“将来局面打开，生意好了，工钱不少给你！”把刘春林稳住下来。

一天，“小雷公”拉着刘春林到街上去逛，走进一家布衣店，“小雷公”说：“我是你‘师叔’，不能看着你穿得这样，来一身吧！”便掏出些钱来，硬给刘春林买了一套新裤褂。刘春林不知是计，一看自己的衣服，确已破烂得没法再穿，也就穿上了。

几天之后，“小雷公”把刘春林找去，说：“我要出门，店里买卖你替我管管，以后我就让你专管人事，你帮‘师叔’的忙，费了心，绝亏不了你，哈哈……”一嘴好话，满口许愿，不管愿意不愿意，硬把帐目交给了刘春林。刘春林心里明白：“管人事”，就是要他当“把头”。刘春林祖祖辈辈穷苦受压迫，对财主有刻骨的仇恨，决不愿成为“小雷公”的帮凶，去欺压自己的穷兄弟。他有一套自己的管法，有人来支工钱，“小雷公”说没有钱，不能“满支”，刘春林说有钱，可以“满支”。有人来领包件活，“小雷公”把粗活当细活，刘春林则说是粗活，可以粗做……。“小雷公”恼了，只好另找一个管事的。

在“小雷公”眼中，刘春林是雕漆铺的支柱，是自己嘴里的一块肥肉，虽然收买不了，但决不能撒手放走，所以整天在打鬼主意。后来听说刘春林没钱办亲事，就马上找刘春林，假仁假义地说：“春林，男大当婚，你该成家了！”

原来，家里早已给刘春林定了一门亲事，只是因为连口也糊不上，实在没法娶亲成家。“小雷公”看出此情，便施出一个诡计：“钱不够，是不是？好说，好说，‘师叔’这里先给

你垫上，你就别操心！”

刘春林怕还不起，不肯借。“小雷公”又把钱送到刘春林父亲面前：“……春林手艺高，准能挣大钱，一年半载就能还清！再说，我是他‘师叔’，慢慢还……唔……还不还，也算不了什么……”一片花言巧语。刘春林父亲是老实人，信以为真，借了六十元。不管儿子愿意不愿意，就办起事来。

刘春林结婚了。中了“小雷公”的圈套。于是，这笔阎王债务，变成了一条无形的锁链，把他牢牢地捆绑住了。

“小雷公”把刘春林拴住后，就卸下伪装，露出本来的凶恶面目。这时，正是旺季，“小雷公”把一大批一大批活交给刘春林，逼着他一天干上十八个钟头甚至二十个钟头的活。白天放下活吃饭，放下筷子又干活。晚上干到三、四点钟，打个盹天就亮了，又得开始干。刘春林的眼睛熬烂了，手指磨破了，腰骨累伤了。“小雷公”不但逼着刘春林拼死拼活地干活，而且更进一步克扣工钱，有时，每月只给三、四块钱，有时根本不给，还板着面孔说：“没有钱。你又欠着‘长支’，不能开工钱了，年终再算吧！”

好容易勒紧裤带熬到大年三十。赶完了活，没欠“长支”的工人领到工钱回家去了，留下刘春林等欠着“长支”的一班人还在店里等着。这时，有钱人家，笑笑嚷嚷，忙着过年。刘春林家还没米下锅呢！他焦急地等着“小雷公”结账。天快黑了。“小雷公”还是只字不提。刘春林实在按捺不住，就向“小雷公”说：

“该结账了，给我们开点工钱好过年！”

“你不看，柜上沒錢了。”“小雷公”说。

“不让我们过年，也得让我们吃饭呀！”大伙儿急了。

“小雷公”这才打发徒弟包了几件成品到当铺去当，假意说：“尽量多当錢”。但当回来把錢一分，每人只够几天的饭錢。徒弟偷偷告诉他们：“小雷公”背地限定只能当这么点錢。大伙儿气炸了。

刘春林已经三个月沒有开支了，家里靠借债度日。“小雷公”只给他十五元，还不够还债。刘春林求“小雷公”多开点錢。

“春林，你‘长支’最多，欠着六十元，要多扣点！”

“什么？我借你六十元，扣来扣去，还有六十元？”

“小雷公”煞地拿出帐本，把算盘拨得连珠乱响，嘴里喃喃地念着：“衣服二十元，办事六十元，一共八十元。连本带利……，还欠六十元！”



严华插图

原来“小雷公”把买衣服的钱也记上帐了。

“我不干了……”刘春林愤愤地说。

“你要不干，把欠的钱补上。”

刘春林越想越气，真想去告“小雷公”一状。可是，想到告状，一事实立刻展现在眼前：一个徒弟，已经学满了三年，按规矩，应该给工钱了。“小雷公”不给。这个徒弟实在憋不下去，就壮着胆子向“小雷公”提出。“小雷公”一听，像豺狼似地嚎叫起来，不容分说，抡起木棍就打，把这个徒弟打得懵头转向，皮开肉绽。这个徒弟告到“警察局”。然而只落得一顿骂：“你顶了掌柜，该打！”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资本家和衙门穿着一条连裆裤，告状有什么用？

树挪死，人挪活。换个地方也许好一些吧！刘春林跑到别的资本家那里去找事。但是谁也不肯用。原来北京的几个雕漆资本家早就串通好，还成立了一个“联合会”，规定谁也不许用谁的工人。

钱，还不起；走，没人雇。刘春林就这样被“小雷公”敲骨吸髓。

刘春林有了一个孩子。数九寒冬，三口人没有一件囫圇衣服，饿着肚子，瑟瑟发抖，在炕上蜷缩成一团。孩子皮包骨头，哭都哭不出声来。接着第二个孩子又出世了。一个孩子还养活不起，又添一个可咋办？怎的也不能叫孩子饿死呀！孩子刚生下来，就含着眼泪送给人了。以后又有了第三个孩子。“小雷公”的手段越来越毒辣了。忙时，照样逼着刘春林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二十个钟头活，照样克扣工钱。不忙

时，干脆让刘春林把活拿回家去做，连稀粥烂菜也不供吃，并压低工钱，每月只给七、八元。刘春林看见干包件活的每月能挣十几二十块钱，就要求“小雷公”让他改为包件。“小雷公”一瞪眼：“你欠着‘长支’，不能改！”又冻又饿的生活，折磨得两个孩子瘦弱不堪，全都得了重病。刘春林急坏了，被逼得无法，去向“小雷公”借钱。狼心狗肺的“小雷公”，还是那句话：“你欠着‘长支’，不能借支。”

没有办法，只好借点“印子钱”给孩子治病，但一点钱怎能医大病呢？两个孩子在一个月之间先后死去了。永远没法还清的“长支”又加上“印子钱”，把刘春林缚得气也喘不过来了。“小雷公”那里活不多，就把刘春林一脚踢开了，死活不管。好不容易找到个泥瓦小工的活。但只干了几天，“小雷公”揽到一批活，立即又派人来找他回去。刘春林不愿意，那人威胁着说：“你欠着‘长支’，掌柜的可不答应你……”回去干了两个月，把活赶完了，又将刘春林踢开，再想去当小工，没有了。刘春林就这样在饥饿线上挣扎，后来生下的几个孩子，又是遭到同样悲惨的命运，被逼得死的死，卖的卖，送人的送人……。

被“小雷公”用“长支”锁住，遭受“小雷公”剥削榨取，弄得家破人亡的，又何止刘春林一人。一个叫吉得福的师傅，也是欠了“长支”，“小雷公”不开工钱。逼得他连一个老父亲也养不起，饥寒交迫。父子二人都得了病，又没钱交房租，被赶出来，冻死在街上。

当刘春林有了第七个孩子的时候，他和妻子合计，怎样

也得保住这个孩子。他托人苦说，从车厂租了一辆人力车。淡季，白天拉车，晚上给“小雷公”干活；旺季，晚上拉车，白天给“小雷公”干活。就这样白天黑夜拼命干，仍然吃不上饭。

刘春林把心一横，让妻子出去当佣人。孩子呢，一个人放在家里。妻子当佣人，没有工钱。刘春林挣上一顿，孩子就跟着吃一顿，什么时候挣到，就什么时候吃。一天，刘春林回到家里一看，孩子呆呆地躺在炕上，身上滚烫，脸色绯红，一双眼睛紧闭着，鼻孔里呼呼作响，叫了半天，也不应一声。刘春林知道：孩子又是饿病了！

他们懂得，穷人是养不活一个孩子的。流着泪把唯一的孩子又送走。孩子懂事了，当有人来领他时，一头扑在妈妈的怀里，哭叫着：“我不去呀！我不去呀！”刘春林不忍再听孩子离别的哭叫声，躲了出去……

一九四八年初春，刘春林的妻子又要临产了。家里米无一粒，煤无一块。天不亮，刘春林就拉车出去，想挣点钱买些吃的回来。但一直兜到十点钟，才有个顾主。刘春林饿着肚子，连拉带跌地从菜市口拉到丰台。没想到，那家伙是个流氓骗子，一下车就溜走了。

刘春林蓬头垢面，失魂落魄地围着空车子转来转去，不知道该咋办好？幸好又来了一个顾主。刘春林摇摇晃晃，气喘喘地将车往城里拉。当他赶到城里，头晕眼花，腰酸腿软倒了下去。直歇了一个多钟头，才勉强缓过气来，用那一趟车钱，买了两个馒头、几个鸡蛋往家里奔。这时，在北京城西南角

的坟地旁边，一间破漏的茅屋，屋墙已经塌了一面，狂啸的北风无阻拦地扑向屋内一个女人的身上。她就是刘春林的妻子。孩子生下来了，可孩子的母亲却昏厥过去，流血不止。若不是刘春林早一步赶到家，不要说孩子，连大人也难保住。

但是刘春林自己由于劳累过度，第二天，也病倒了……

乌云被吹散，天空出了太阳，北京解放了！派出所知道刘春林的困难，救济他一百五十斤小米，把他一家从垂死中救出来。

解放了，解放了，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也砍断了缚在刘春林身上的这条无形的锁链。

吃尽旧日苦，更知今日甜。刘春林懂得：缚在他身上的，是阶级压迫剥削的锁链，也是缚在千百万劳动人民身上的锁链，必须彻底地粉碎这条锁链！解放了的刘春林有了工作，他懂得工作就是革命。他进步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选为北京市人民法院的陪审员和北京市西城区的人民代表，并被评选为工艺美术艺人，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

现在，刘春林又有了五个孩子。大孩子，就是因解放才得以保住的那个孩子，已经十八岁，念完初中后，进了雕漆厂当学徒。第二个孩子在念初中，第三、第四个孩子念小学。一家七口，过着愉快、幸福的生活。

家

柏 青

无私的心灵

炎热的夏夜，人们都在大院里纳凉。有位老工人却戴起一副老花镜子，把家里的电灯拉到门口，坐在院子里一张小板凳上琢磨一个纸壳模型。“孩子他爹，你明儿抱三小子去看病吧！”妻子从屋里出来，对他说。他聚精会神地揣摩着，没有听见妻子说话。的确，近来他像“傻”了似的，一下班，不往家里走，却到压面房、轧花店去琢磨机器是怎样转动的。回到家里就忙着折腾那模型。成天没听到他说一句话，嘴上像贴了封条。

妻子有点生气了，责怪他：“三小子病了你也不问一句，你不着急？家里你就待不下，成日‘瞎胡’个啥？你不想想我快要……”鄂伊启这才想起妻子快要临产了。他带歉意地说：“三小子的病，由你照料，我放心！”又拿过纸壳模型给她看：“淑琴，为了让玉器工人再也不受过去的那份罪，我正在设计一台搓光机。这两天已琢磨的差不多，搁不下。”

这几句话使她想起了鄂伊启常给孩子们唱的那首歌：“嫁女不嫁玉器郎，一年四季守空房，磨破十指血淋漓，卖儿卖女饿断肠！”鄂伊启从十一岁起，一年四季两手总是磨得血淋淋的不见好肉。现在他是一心为了新玉器工人兄弟。她心里似乎明白了些，但她总觉得丈夫没有疼妻儿的心，于是气呼呼地抱着三小子去睡了。

转眼到了冬天，第一台玉器搓光机转动了。虽然土一点，可是提高了工效，也改善了劳动条件。鄂伊启高兴得流下了眼泪。正当这时，妻子打来一个电话：他最心爱的四女患急性肺炎，正在抢救中。他在电话里安慰妻子：“淑琴，你好好照顾孩子，我下了班一定去看看孩子。”妻子着急了：“孩子……”鄂伊启说：“新机器正在试用，我离不开。你要相信党培养出来的大夫一定会救活孩子的！”

这回妻子更生气了。她不禁又想起他做的件件“傻”事：他连夜搞技术革新，把眼睛熬红肿了。蒙上纱布，医生让他休息一个星期，他却让大女儿扶着去上工，说：“眼瞅不见，还能动嘴。”

夏雨下得大路成了泥河。他下班回家，半路上看见前面一位女工没有伞，光着脚，赶上去一看，还是孕妇。他连忙把伞塞给她，脱下雨鞋硬让她穿上，自己却淋得像只“落汤鸡”。

工厂评奖，他总是把奖金推让给别人……

妻子越想越不通。晚上，鄂伊启从医院回来，她就气呼呼地说：“你不看看，哪一家男人像你呀！心里只有工厂！”

“咱可不能忘本。一个人光顾自己，活着不等于一条虫！有些人跟咱们受苦人的心眼就是不一样，他们整天想的全是‘个人’。这些人的死脑筋不容易换过来。有的要我们工人阶级的事业和精神把他们感动了，才可能转变。却也有的，即使把骨头化成灰也不会把心向着党的！……”

妻子的心有点动了，但还不能理解丈夫：“你总不能不管这个家呀！”“家”，引起了鄂伊启的回忆。他从来没有对妻子提起过去的辛酸事，他怕妻子悲痛。今天，他觉得必须从头到尾讲讲这个“家”。

夜已深，寒风狂啸，大雪纷飞。引他们回忆到那暗无天日的几十年前……

苦水吐不尽

鄂伊启的祖父是蒙古族人。在一个寒冷的雪夜，从蒙古逃荒来到北京郊外。给地主种地，日子混不下去。父亲到城里给财主看门。全家只有一间破小房，炕占去了大半间。炕上铺一张破席子，盖两条破棉絮，五口人一年四季都靠这一铺一盖。用破煤油筒请了点泥当炉灶，锅也没有，只有个破沙锅。桌、椅、柜从来没有见过。他爸爸一个月只有三块钱的收入，哪能养活三个儿子和妻子。为了糊口，起早摸黑地捏些小泥人，拿到东安市场去卖。他和哥哥就帮着干些零活。就这样也还是不够维持生活。哥哥和他常去拣煤核。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日夜操劳，又经常挨饿，结果得了肺病，咳嗽、气喘，一天比一天枯瘦。他妈为了救他爸的命，去借

了点“印子钱”，这笔阎王帐就套在脖子上了，怎么也还不清啦！

就这样，日子越过越艰难。一家人常常饿着肚子睡上炕，谁也不敢吭一声。只有不懂事的小弟弟常常哭着要吃的，吵得爸爸烦了，就揍他两下，母亲心疼，不敢多说，只是含着泪哄着小弟……日子就这样熬、熬……

鄂伊启十一岁那年，他爸爸就被贫病折磨死了。债主听到消息便逼上门来，死人还在炕上，债主可是不走，逼得他妈妈不知怎么办好。只好把所有能卖的破烂东西全卖光了，还不够还债。妈只好让哥哥去天津当学徒，小弟弟送给人家。鄂伊启险些卖给了人贩子，幸亏他叔叔得到消息，跟着他妈紧追到人贩子家，好歹领了回来。经叔叔托人介绍到了花市“顾全禄”玉器店去当学徒。

鄂伊启刚被引到顾掌柜那里，那个矮胖老头就对他叔说：“学徒投河觅井，掌柜概不负责。”他当时虽只十一岁，但也懂得一点人事了，心想：“好好的人干吗要投河觅井？”但是，他哪会想到走进这个店门，就像进了阎王殿。那里共有六个师兄弟，住在一小间破房里。他们一天到晚要干上十六小时的活。天晓得，哪里教他手艺，他整天煮饭、倒尿盆、抹桌、扫地……。破房里跳蚤、虱子、臭虫咬得他们满身红肿，人瘦得皮包骨头。每天吃芥菜小米粥，又苦又辣，从来见不到米面，想吃顿窝窝头也难哪！

在那时，他上茅房常常扶着墙就睡着了。给掌柜看到，就满头满脸的一顿毒打。有一次，他实在困极了，但还得一

面熬粥，一面擦煤油灯罩。当他熬熟一锅粥，一碗一碗盛好，却见师兄们吃时直皱眉。他想：“皱什么眉，还不是天天吃这苦辣粥。在这閻王殿还想吃甜窝窝头？”可再一看，不对劲，师兄们后来一个个地都放下碗筷不吃了。掌柜一股杀气地跑过来，叫他先喝一口，他看这股来势知道大祸临头。一尝，呀！一股煤油味，这才知道是方才困得厉害，让一块擦煤油灯罩的布掉下粥锅去了。掌柜拿起棍子朝他劈头两下，木棍一下打成两段。他哭都哭不出声。把他打得死去活来，直打得矮胖老头没了气力，才歇手。几个师兄把他扶起来，只听得掌柜还在破口大骂：“小畜牲，这锅粥不能叫你白白糟踏了，给我喝完！一天喝不完喝两天，两天喝不完喝三天……”鄂伊启忍着苦辣怪味，含着泪，一口口地咽。咽不下，又不能吐出来，真比吃药还难。整整喝了三天……

像这样牛马不如的学徒生活，他熬了整六年。满师后又是“帮师”两年。

给矮胖掌柜白白干了八年。鄂伊启以为转一个地方会好一点，哪知，连转了两个玉器店，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处一样受剥削。

在那些年月，军阀连年混战，国民党欺压人民，玉器行业好像一盏快灭了的灯。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人民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玉器行业这盏灯灭了，所有手工艺行业也都完了。

他走投无路，好容易央人租了一辆洋车，风里来雨里去地日夜奔跑。这样卖命地拉一天只能挣五六千元伪币，扣去

租车费一千七百元，剩下的最多能买两斤“混合面”。有时，碰到鬼子、伪军坐上车，累死拉不到一文钱，车租还得照缴。市上的粮价一个钟头变几次。真要整死穷人。穷人排队买粮，还要挨巡捕警察的皮鞭、棍子。买回来的是又臭又硬的“混合面”。

有一天，一个鬼子军官见车就上，一坐上去就嚷：“快快的！……”他已经跑得很快，那鬼子却还嫌慢，双脚直踩车脚踏板。他一天没有吃的，又饿又累，实在没劲拉了，鬼子跳下车来就用皮靴乱踢乱踩，将他踢晕了过去……

鄂伊启三十一岁那年，他妈已有五十一岁了。任凭他拚命地拉车，娘儿俩的生活还是难熬。到了冬天，两人还都穿着破单衫裤。他妈老是咳嗽，指望着他每天晚上回家带点吃的。有一回，鬼子戒严，十多天城门被封得严森森的，他心头一把怒火，烧得欲炸。直到阴历二月初六才出城。他急急忙忙拉车往家跑。当时刮着刺骨的大风，飘着大雪。赶到家里，母亲躺在光板席上，哆哆嗦成一团。他见到了，心里像一阵刀绞。赶忙说：“妈，我给您买了两斤黑豆，煮熟了吃吧！暖和暖和！”只见妈的嘴唇抖动了一下，却没有说出话来。他心里明白，这是冻的、饿的。他赶紧拿起两块木柴，生旺了火，用破砂锅煮熟了豆。可是他妈有气无力地睁了睁眼，手直哆嗦，只是摇头，几滴眼泪从干枯的眼角淌下来。他劝妈好歹吃一点暖和暖和，她却只是微弱地呻吟着……鄂伊启抓住他妈的双手，妈的手像冰一样的凉。妈就这样死去了。这时，外面的狂风呼啸，大雪漫天遍地飞舞。屋子像要被吹破，



严华插图

要被雪盖压了。他的心好比万箭穿心般绞痛。

就这样，旧社会逼得鄂伊启失去了家，失去了最后的一个亲人。

从此，他就过着流浪的生活。白天黑夜拉着洋车，以破车为家。露宿在街头巷尾，或是蜷缩在又暗又臭的车厂里……

在那暗无天日的年月里，鬼子走了，国民党反动派又来了。穷人终日受罪，受冻、挨饿，在死亡线上挣扎。他就这样流浪了许多年。

国家的主人

东方升起了红太阳，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鄂伊启才得到了新生。他有了工作，在四十二岁时结婚成立新家了。

一九五五年他又重回到玉器行业当工人。看到玉器行业恢复发展得这么快，看到自己当家作主的合作社，他激动得很。当他第一次参加社员代表大会时，竟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一九五八年建立玉器工厂。高高的厂房，使他看了发楞。过去，这样的楼房只有洋鬼子、“官老爷”才能住。今天，却是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在这里劳动。这个厂有一千五百多工人，为国家生产着大量财富。工人有着固定的工薪，徒工由厂里发给生活费用。他们还享受着公费医疗和生活福利费等待遇。八小时劳动后，晚上经常组织看电影、话剧、评剧等。工厂还办了职工业余技术学校和文化学习班。这些，和过去一比，真是天上地下，两个世界！

随着生产的发展，鄂伊启和大伙儿的家庭一样，生活在逐步提高。他每月工资七十八元，家庭生活安排得很好，有了收音机、衣柜……每月还拿出钱来支援别人。他想到的是：“翻身不能忘本！”他想：“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要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铺砖砌瓦。也只是有了国家，有了工厂，才会有自己。”于是，鄂伊启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家。这是一个更新的家，更大的家。他宁愿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交付给这个“家”。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他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人。

一九六〇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他当了车间组长后，他的“精神劲”更加焕发。五十多岁的人了，却比二十五岁的小伙子还棒。每个星期日，不是在车间修工具，就是去访问家属。每天中午带着一盒饭，吃完后，就在厂里转游，人家问他：“同志，你为什么不回家去？家里离工厂很近呀！”他笑呵呵地回答说：“青年人好睡一会儿，我不缺觉，在工厂里转转，做做保卫工作也是应当的。越是大家休息的时候，越要提高警惕性呀！”他说完话就走开了，他心想：“工厂不靠我们工人护着是不行的！何况，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呢！”

他为了当好一个国家的主人，积极地学文化，学绘画素描，还学技术课。夜晚，常常戴起老花镜子读书，妻子有时问他：“八十岁学吹鼓手，还学得进去吗？”他说：“天下无难事，就怕有心人！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是毛泽东时代的新工人啦！不努力学文化，闹不了技术革命呀！也当不好主人呀！”

妻子终于真正地理解了他。他向她说：“淑琴，我还要像这样干几十年，天天守着工厂，你不会有意见了吧！”她笑了，为他感到由衷的自豪和幸福。

